



抢救记忆 追寻真相 交流信息 积累资料

第 21 期 2013 年 6 月 25 日

目 录

【按“Ctrl”键+鼠标点击篇名选择】

北大右派校友致信李克强总理·	2
邝忠龄右派日记（上）·孙丹年整理·	4
中国的“劳动教养”是怎样教养右派的·佚名·	26
陈祚璜古体诗词选·	33
他们还有绝招·振 秋·	36
我们这代人·佚 名·	37
张淑芬著《我所认识的右派》读后感·陈在辰·	38
誰感謝誰？·北 明·	40

《巴山夜雨》电子邮箱：bsyy1957@126.com

北大右派校友致信李克强总理

尊敬的李总理：

我们都是北大校友，祝贺您就任国务院总理。我们以校友的亲切心情给您写这封信，向您反映一下我们对反右派运动的看法和意见。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在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欢迎党外人士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并提出“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言者无罪”是对全国人民的承诺。就是在这一承诺下，出现了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的高潮，给共产党提出很多诚恳的批评意见。特别是当年二十岁左右的北大学子满腔爱国热情给共产党提出很多批评意见，例如扩大民主、健全法制、防止个人崇拜等等。但是，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整风忽然转为反右派运动，轰轰烈烈，历时一年多。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共划右派分子317万多人（3178470人），还划“中右分子”143万多人（1437562人）。更为遗憾的是，还有一批“没有划为右派分子就错按右派分子对待”的人，同样劳动改造几十年。全加在一起约有500万人受到打击迫害。然而，这500万人经过几十年的痛苦磨难之后，除96人之外全都予以改正或纠正。可见这500万人都是冤案，冤案率高达99.99%以上。反右派运动这样的劣迹，足以说明反右派运动是完全错误的。这500万人都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在经济上精神上受到很大损失和伤害。请注意，这500万受害者都是知识精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们是中了“阳谋”诡计遭到打击迫害的无辜者。这是国家的耻辱，民族的悲哀。

以北大为例。北大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划右派分子716人（北大是划右派分子最多的一个单位），还划“中右分子”三、四百人，还有一批“没有划为右派分子就错按右派分子对待的人”。总共有一千多人受到打击迫害。然而，经过几十年的痛苦磨难之后，经复查这一千多个受害者，除一人“因去国外不予复查”之外全部得到改正或纠正。也就是说都是冤案。现知其中有26人非正常死亡：有的在监狱中或劳改营中饿死、病死，有的卧轨，有的跳海，还有8人被枪毙了。他们连“改正书”都没有见到，多么令人悲痛啊！这一千多人都是北大精英，竟遭如此厄运，这是北大的耻辱，民族的悲哀。您作为北大校友是不是也感到悲痛呢？

顺便说一下划右派分子最多的第二个单位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划右派分子571人（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复查时100%得到改正，就是说全都是冤案（详见《清华大学九十年》）。这571人全是清华的精英，可惜都给毁掉了。习近平总书记是清华校友不知有何感想，是不是也感到悲痛呢？

想当初1978年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和无私无畏的精神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给反右派运动受害者改正或纠正。这件事深得民心，功德无量，有口皆碑，青史留名。遗憾的是，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处理好善后工作（包括赔偿问题）。

我们反右派运动受害者，提出如下诉求：

一、公民有言论的自由，而反右派运动是“以言定罪”，这是违反宪法的，也是违背“言者无罪”承诺的不道德的行为，还因为反右派运动劣迹昭彰，应该彻底否定反右派运动。

二、按生活指数赔偿反右派运动受害者几十年的经济损失和遭受精神伤害的精神损失。具体赔偿方案协商解决，原则是合情、合理、合法，体现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公平正义得以伸张，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请总理考虑，文革时期受害者都给赔偿、补发工资了。反右受害者也应给赔偿、补发工资，这才公道。这是深得民心的大事，亦将青史留名。

德国经验：2007年6月14日《参考消息》报道

“对166.5万纳粹强制劳工完成官方赔偿”

【路透社柏林6月12日电】德国今天关闭了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向全世界166.5万名希特勒时代的受害者支付了超过43.7亿欧元。“在庆祝‘纪念、责任与未来’基金会工作正式结束的仪式上，德国总理默克尔说，自从二战结束以来，德国已支付了约640亿欧元用于赔款与补偿。但是在这个基金会成立之前，被强迫的劳工没得到什么直接的补偿。这些劳工大多数被迫在艰苦的环境中劳作。”

可知这“超过43.7亿欧元”是补偿这些劳工的。请总理深思，是否可以借鉴。您是北大出身的总理，应该有点北大精神，为北大争光，为国家争光。

三、要求毛泽东的继任者赔礼道歉，挽回共产党的声誉，取信于民。请牢记：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这是一条真理。

四、要求中央领导学习胡耀邦无私无畏的精神，顶住党内外政治压力，主持正义，以宪法为准绳，追究违宪者的责任。

我们的诉求是合理合法的，合乎宪法精神，合乎公平正义原则。请中央领导主持正义、根据宪法精神和一般法律原则妥善处理。请回信。

致以诚挚的问候，并请转呈

中共中央政治局

全国人大常委会

您的北大校友、反右派运动受害者

执笔人 闫桂勋

联署人 岑超南 王书瑶 燕遜符 博绳武

余庆水 沈志庸 纪增善

2013年3月18日

邝忠龄右派日记（上）

孙丹年整理

题记——

中国的的新政权建立后，司法刑事制度也向苏联学习，全盘苏化，

整个苏维埃的刑事政策建立在镇压与强迫原则和说服与再教育原则的辩证的结合上。

与资产阶级的刑罚不同，在我们这里，使犯人受到痛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的目的在于真正的改造，要使从劳改营里出来的人都成为有觉悟的劳动者。

——见维辛斯基为阿维尔巴赫《从罪犯到劳动》一书写的序言，第 6—7 页

无非是劳动，劳动，劳动；无非是饥饿，寒冷，耍滑，藏奸。也就是在地上建起一个社会主义，而把我们自己赶进地下去的那种劳动。

最快变成垂死者的是知识分子；我知道的垂死者都是知识分子。从未见到普通俄国农民变成垂死者的。

——见索尔仁尼琴著《古拉格群岛》田大畏、陈汉章译，中册，第 187、201 页

日记作者及内容简介：

日记作者邝忠龄，原为西南师院附属小学的老师，教语文并担任班主任。

邝忠龄出生于 1930 年农历 4 月 17 日，日记开始时 28 周岁。邝忠龄因不愿与右派分子丈夫孙铭勋离婚，“划不清界限”，1958 年在“按比例凑足名额”时被补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保留公职、劳动改造”的处理。

邝忠龄被迫离开她熟悉和热爱的教师岗位，编入西南师院右派劳改队，进行强迫性集体劳动改造。她与部分大学老师如中文系的曹慕樊、刘又辛，历史系的赵彦青、肖成智，数学系的胥本馨等一起共 20 多人，来到北碚金刚公社金刚大队李子林“红专铁厂”，辗转于附近几个生产队。红专铁厂与西师的距离，以邝忠龄的步行速度计，约需近一小时。此地位于缙云山腰，土埂路和石板小道都极其陡峭，几乎是直上直下，他们每天上下来回地挑煤、挑铁、挑石灰石，修公路便道，任务定额很重。

一个年轻单纯、善良热情、具有从事教育工作的天赋、艺术感觉敏锐、对政治毫无兴趣的女性，“资产阶级原罪”如泰山压顶，在被强制监管的集体生活中、在高不可及、永远达不到的改造目标下、在对丈夫孩子的苦苦思念中，悲惨挣扎。

为了使右派分子们“认罪服输”，采取了一整套严格控制思维的措施，不断进行政治“洗脑”。学习文件后要求复述内容，要求按照文件标准剖析自己的“反动思想”，并按时向带队干部作口头的、书面的思想汇报。定期检查评比，互相监督批评，“深挖罪恶的思想认识”。

多数右派分子对中共抱有基本信任，甚至无条件热爱；来自于“党”的不论号召还是惩罚，他们都作出积极回应，认真对待；他们那惯于思考的大脑，极其痛苦和悲惨地被迫承认、或拒绝承认强加的罪名；他们被迫离开熟悉、擅长、热爱的岗位，以文弱之躯，承受繁重的苦役；“党”用滚石头上坡的痛苦作为手段，无情地折磨他们。

大饥荒刚刚才露出苗头。

这却是邝忠龄 22 年右派生涯开始时较为轻松的一段日子，日记第一篇的 1959 年元旦，甚至过得很“幸福”。日记中反复出现“今天很愉快”的字样，但屈辱、辛酸、困顿、荒谬的残酷真相隐匿在字面之下，渐次呈现出狰狞。到日记结束时，由于饥饿、疾病、苦役、思想的重负、前途的黑暗、对家庭的愧疚，邝忠龄已经握不住那管原本轻捷自如的笔，所记内容越来越简略，越来越悲苦，终于停笔。

日记时段从 1959 年 1 月 1 日起，至 1960 年 9 月 5 日止，其中 1959 年从元旦到 12 月 31 日的记录基本完整。

这本记录作者日记的“幸福”笔记本，硬壳，规格为小 32 开。这是一份礼品，第一页上有钢笔字：

敬爱的邝忠龄老师留念：

愿您在民盟组织的教育下，“发挥潜力，提高觉悟，加强团结，联系群众”，为培养祖国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贡献出一切力量（录者注：在“反右运动”开始前夕，此赠语充满着讽刺意味）！

您的学生和战友：曾欣然 叶贵康 廖海如 杜幻伦

胡守陵 张玉文 王大文 1957, 5, 7.

笔记本封面上，两个女性少先队员站在天安门金水桥前手指天空，空中有七只和平鸽在翻飞。扉页上印刷一条标语“一切为着建设祖国”。扉页之后是一幅插图，一对工农夫妇的手推车里装着一个幼儿，说明“劳动带来了幸福”。

日 记 正 文

说明：1、括号内注释，凡是宋体字的皆为原文；凡是仿宋字的，为录者所加；

2、尽量遵照原文，语气及标点一般不改动，错别字酌情改动；

3、人名和称谓，第一次出现时加注，以后不再加注。

1959 年 1 月 1 日，星期四，气候阴雨

（元旦节，不允许右派分子们回家）

昨夜过得很不平凡，我们完成了指挥部交给我们的任务以后，已经十一点了。回到住处晚会开始，大家吃糖果点心，欢迎表演节目。王抒情（吴宓日记中为“王素琴”）表演的笑话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刘又辛唱的京戏很不错，我也唱了歌和京戏。我兴致很高，把思念家里的心思忘记了。

郭老师（带队干部，其名字音“郭宝知”，邝忠龄认为他是一个较为朴实正直的人，具有政策观念，能较为合情合理地对待右派们）作了总结谈话，指出我们在五八年改造的成绩，还指出今年应该注重思想改造与劳动并重，加强政治学习。党要求我们在今年内全部摘掉右

派臭帽子。他说我们从西师那种环境下乡来生活，是个 180 度大转弯，大家在通过劳动作一个普通劳动者这方面，目的是明确的，态度是认真的，在劳动中，感到自己为建设社会主义出一分力量而高兴。但是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不够，应该改造自己成为党的驯服的工具，成为人民的勤勤恳恳的服务员，忠心耿耿的为人民做事。在工作上不讲条件，不考虑个人问题，只要党需要，就愉快地去做。拿他自己来说，党交给他帮助我们这一群人改造（的任务），在工作中贯彻宽大与严肃的原则，抓思想抓劳动抓生活，他分析了自己的工作情况，觉得自己愉快地接受这个任务，是光荣的任务。



郭老师朴实而平易近人，毫不做作，也无城府。我觉得有话总想给他说（划为右派分子后，邝忠龄全家政治上遭打击、经济上遭剥夺、社会地位降至罪犯一般、有家不能回。但她不明白自己错在哪儿，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希望上级能倾听她诉说委屈），但目前还做不到这点。我想，不久我可以做到的。

1956 年 8 月孙铭勋、邝忠龄与两个女儿合影

1959 年 1 月 2 日，星期五，气候阴

我们都盼望今天放假，好回家去，但是厂长没回来，因此我也不起床。后来厂长回来了，郭老师却回来睡下了，我们都明白没有希望了。

晚上同老肖（肖成智，西师历史系助教）谈，肖说最近要公布一批人摘帽子，我希望有我，但没有把握，但愿有我。

张某的流氓气使我浑身不快，克制不了。

1959 年 1 月 3 日，星期六，气候阴

今早饭以后，郭老师宣布放假一天，我非常欢喜。立即飞快地收拾好回家来了，只走了 45 分钟。到家丹年两姊妹还没上学（丹年 7 岁，本该上小学了，但因去秋招生时不足 7 周岁，西师附小不录取；丹平 4 岁，都在上西师幼儿园），我给她们梳好头发送走了，两个都很听话，很逗人爱。

母亲情绪不够好，因为她把丹年拾来的菜油票拿去用了，结果发现是别人偷来失掉的，她立刻向组织上交代了。我觉得她谈得对。从这件事可以看得出一个人只要在思想上一时放松，便会犯错误。



晚饭吃得很饱，可惜没好好同孩子玩一玩，我很希望梁大姐（请来帮助做家务的人）快走，她老坐着不走。听她句句不离黎涤玄（黎涤玄是梁漱溟的侄女婿，划为右派后，劳改中去世）。

1959年1月4日，星期日，气候阴

整天都是担矿石到红专，我很想多跑一趟，上午因为路泥泞难走，没成功，下午又跑累了，又没成功。明天是否成功呢？我没信心。

听说付某（西师附小女教师，邝忠龄同事）参加反共救国军事发，已停职，首先我诧异“她不是已经交代了吗？”别人说：“你知道她交代完了吗？”我才想到我这又是对党不能坚决信任，尽管我下决心要相信党，一遇具体问题又反应出来了。

总是忍不住胡思乱想，谁能先摘帽子？有没有我？

为什么今年的布票、油票等并不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多呢？

1959年1月5日，星期一，气候晴

今天上午在幺店子运煤，郭老师对大家说，年也过了，家也回了，玩也玩了，但劳动起来劲头总不大，思想上有些问题，想到今年还没有摘帽子，特别是回家去谈一谈，看看形势变化很大，想想自己有些着急。应当在劳动和学习上表现自己。并宣布今晚民主生活。

上午我争取在四个钟头内担六次，每次中途不歇气，结果两个半钟头跑了五次，后来没有煤了。由此可见，五个钟头我可以跑九次。

下午疲乏得很，走红专两趟，担得少。

郭老师宣布了本月的学习计划，杨宗义给我提了个意见，希望我努力学习政治理论，我一定好好学。还宣布了今年的评比条件，我觉得很具体，做得到。

最后座谈了“如何对待摘帽子”、“劳动与思想改造的关系”。

老董爱喊：“喂，三个女的，出来。”我很不满意，难道我们没有名字吗？我也要喊他“男的”，他还认为“这有什么关系？”郭老师也批评他不尊重人，他才不做声了。

1959年1月6日，星期二，气候阴

这几天很冷，寒风刺骨。

今上午再修洗煤池，拆砖，起泥，手脚冻得疼痛，我又使不来锄头，吃力不讨好。老肖总不想伸出手来扔稀脏的砖头，起初她专门用沙钎起砖，叫人家扔，后来她强调她扔不动，继之她又说断砖没多大用处，不必扔，我觉得她病后无力是事实，可是她在思想上不争上游。我自己劲也不大。

下午跑红专，我想走三趟，但又想省点力，和廖谈了一下自己坚定了，结果达到了，最后一趟恰好六点。最后一趟快到红专时碰到张某才回转，他为什么这样慢呢？我疑心他在等我，真讨厌。于是我走捷路避开他。我已到了坡顶，远远望见他还在半坡慢慢走，我很为自己高兴，很快地追上唐继华（下文为“唐季华”）他们，把他甩在后面了。

很想吃糖（邝忠龄患有肾病，需要吃糖）。有时想铭勋不知好了一些没有，望他回去参加鉴定。

1959年1月7日，星期三，气候阴

今天上午送石灰到建筑工程处，从区人委旁边过。我想到附小的高年级儿童可能在那里上体育课，果然事情这么凑巧，正好是过去我教过的那班在那儿上课，很远我就看见郭台地、熊楚平、郑三乐等孩子，我想糟了，但又不想折回去，硬着头皮往他们面前走去，最初他们没注意到我，后来发现了我就喊起来了：“邝忠龄来了，看啰！”我真正处之泰然，颤着扁担过去了。回来时我绕路走了，一则为了避开他们，二则免得妨碍他们上课。可是我忘了向组长请假（绕道也需请假）。后来谭古诗向我提出意见。

下午有区委来人，郭老师留下八个人等着不去劳动。其中有廖，也有胡、马……我又瞎猜疑了，以为有人要摘帽子，有人生病要调回学校，虽明知不对，总免不了要想。

晚上回来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我所想，党亲自到群众中了解情况，对我们很关心。

1959年1月8日，星期四，气候阴雨

昨晚正在学习报纸，黄老师来叫我去写保证书。指挥部生着火盆（右派们的住处是多么寒冷啊），直到十一点半才写完。这几天冷得很，尤其是夜晚。

今上午幺店子转煤，煤完了挑渣。我和老董一起休息，他和胥本馨开玩笑，叫他回去抱娃儿，我也说了胥一句，老董就发火了，使我莫名其妙，陈敬维为我解释了几句，老董自己大概感到不对了，又改变了态度，特别和善。我也有点动气，但想到不应要态度，没说出来。

下午去新煤洞挑焦煤送红专，路远，大家思想上都紧张，十二点半就动身，我和赵彦青（西师历史系老师）一道。一路谈谈说说，很投契，我喜欢和他相处。我谈到铭勋对我少谈思想问题，他说他对他的爱人也这样，没什么可谈的，我想这是人生经验相差太远的缘故。

很盼望十号回家去，看看铭勋。

大家对我有个意见，觉得我担的分量不够。明天试一试多担些。

1959年1月9日，星期五，气候雪

今天下雪，我起初没抬头看，以为是下雨，很怕冷，后来到幺店子偶然抬头发现下的是雪，立刻就觉得冷得愉快。雪下得很大，杨宗义讲了一个笑话，虽然寒气刺骨，衣服内外都湿透，可是大家情绪是很好的。

上午从新煤洞挑煤到红专，路远，很紧张。中午吃饭已一点多。下午从本厂运焦煤到红专，人已疲倦，到了以后那个解放军又叫我们到金刚碑河边去挑沙。我有点不愿意，勉强挑了一次，听说还要挑，更不高兴，就慢慢走，结果那个解放军等在那里，亲自指点我倾沙，再三交代我立刻回李子林厂，我又感到惭愧。

晚饭又迟到，炊事员不大高兴，说了几句。胡子俊也埋怨任务太重，生活照顾不好。

郭老师对于有些人的纪律松弛，自由散漫提出了批评。晚上允许我们在被窝内学习，廖说是真英明，我也很满意，因为天气真是冷得够受，雪纷纷下一直未停。很盼望放假回家。

1959年1月10日，星期六，气候雪

今天仍然下大雪，早上起来一看，缙云山上凝满白雪，厂里好多屋顶上也积了雪，光芒耀眼。指挥部宣布不上班，社员讨论会，我们派人去挑米。去了十二个大汉，我们留在家学习。郭老师自己穿得单薄，却总耽心我们冷，封了窗，又叫我们把床上的草垫厚些。我们做

完这些已经九点半，才开始学习。冷得要命，简直不想伸出手来。下午上么店子挑了一次煤，我挑得重，心里很愉快。

晚饭四点多钟就吃了，因为社员放假要回家（在铁厂上班的社员放假），我看不见人家回家，我更想回家了，很希望我们也放假。

今天听见人家向郭老师汇报思想，有些思想我也是有的，却忽略了。如不喜欢吃稀饭，说罐罐饭还好些。我也想汇报，可是我不想卷着身子在这个家里谈，因此没去谈。

许多天没吃糖了，想念得很。又想回家看看铭勋回来了没有。

六点钟开始讨论：1、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机器对内职能是否消失；2、工农阶级的差别消灭了才叫社会主义；3、个人得全面发展条件才消灭私有制。最后一个问题没得结论。

1959年1月11日，星期日，气候晴

郭老师宣布放假，晚上回来。

我和廖一道走，又遇到赵彦青成光华等，赵帮我拿被盖。我很耽心回家免不了遇上附小的孩子们，结果还好，平安无事到了家。

洗了澡又洗衣服，还没洗完就十一点半了，下午洗头发，把衣服洗完，煮肉，切红苕，办盐巴（用少许菜油煎“油盐巴”，放大量野葱。当时粮食和蔬菜供应都开始紧张，“油盐巴”是最佳下饭菜。许多人饿急时往往直接吃盐，导致更加浮肿。丹年曾多次喝酱油，有一次喝下近小半瓶，难过了好几个钟头），忙忙碌碌一天就过去了，觉得相当紧张。

今天没去看铭勋，听说他月半要回家。心里总有些挂惦。

1959年1月12日，星期一，气候晴

今天是个好天气。上午送石灰上街，挑了五十九斤。下午“照顾”我们年老体弱及妇女，在么店子挑夹子，先挑一担焦煤到红专，挑得很轻，可是头晕，发胀，有点发烧，骨头酥软，浑身酸痛。我很想请假去睡了，但又想支持过去，结果还是支持过去了。

郭老师给老肖提了一个意见，说我们三人不很团结（指邝、肖、廖三个女性），在政治上互相帮助不够，行动也不大在一起。这其实也是给我们三个人提的意见。

对公约中“平时不吃糖”这一条我觉得很恼火，也不服气，为什么吃烟又可以呢？

1959年1月16日，星期五，气候晴

生病，回家三天。

今天上午九点廿分出发，十一点四十分才到厂，在街上取了钢笔，修了电筒，慢慢地走。第一个碰见的是谭古诗，他告诉我自我走以后接连几个人病倒了。大家看见我来了，都问我好了没有。下午组长叫我休息，别人也照顾我。我去向郭老师汇报，我先讲，然后他指出：

1、对待公约要自觉地遵守，要从思想上认识，要求自己应该严格些。执行时要灵活些，吃饱了就不必吃糖，饿了自然可以买。吸烟不算吃东西。有些人被公约限制了，不吃酒糖，大吃生红苕，吃坏了肚子怎办？（还有省钱）

2、你教小学各门都懂，但不精，他们大学理论的确高一些，但学习不光是学文件，文件也非一看就懂，要顽强学习，还要通过讨论，得到启发。社员文化并不高，可是诗写得好，右派文化高，观点立场不正确，不见得真懂。要明确学习目的，学理论是为了武装头脑。

3、要全面改造，抓思想抓劳动抓生活，你的身体比刚来时健康多了，这是劳动的缘故。

4、对孙铭勋的批判，主要是同他划清界限（郭宝知为人宽厚，不像后来薛迪宽要求邝忠龄交代夫妻之间说的“反动话”），学点资料有帮助，你自己去找，找不到也就算了。要对自己的问题放到主要地位。

5、对摘帽子问题，硬是不应乱猜，越想越多，妨碍改造，小广播是不好的。

6、你的汇报是老实的，这是好的，谈出来是很对的。

晚上民主生活，分三组进行。我们这一组都是谈自己，都检查了自己的劳动态度，政治学习，和生活制度。到十一点半才睡。

1959年1月17日，星期六，气候晴

今晨起床后，精神较前健旺。组长派我打扫院坝，一会儿便腰酸。直到十二点正，才勉强搞好，满身汗水。想洗痰盒，结果未洗，一则因时间不够，二则嫌脏。

下午是捡铁，渐感不适，头晕脑胀，发烧骨酸的现象又出现了。我打算支持过去，但结果没支过，还是去睡了。我们睡着，廖给我提出那天请病假没按时回来，是娇气与组织性差。并说大家有意见。我自己也检查确是这样。这叫做青山易改，本性难移。可是现在我也并不很重视这个问题，觉得不很要紧。

1959年1月18日，星期日，气候雨

早餐打牙祭，吃瘟猪肉。我拣瘦的吃了，把肥的和油留下来了，今天这次牙祭我很满意。上午挑焦煤到红专，临走时组长命令我送廖回家去，她不肯走，我劝她好一阵才肯了，我俩冒雨走着，她精神很坏，走得很慢。我也有个自私的打算，想顺便回家看看铭勋回来了没有。

时间非常紧，回家一看，铭勋已经（从医院）回来的，16日回来的。我看他精神还是不好，皮泡眼肿。我花了一元钱修理的钢笔（被他）拿去了，还想用我的表，但知道我也要用，没拿。我向他要零用钱，他给了我一元，但说明他取了手表以后就剩下不多了。我吃红苕糯米饭，他责备我吃了他们就够了。我发现他比过去好吃了，饼干，广柑，菜，饭，他都喜欢。我希望在他过生日那一天，让他吃个够。

我耽心母亲走后，铭勋独力照顾两个小孩有困难。母亲说不能找人，群众影响不好，对铭勋不利。我对铭勋说得学习烧蜂窝炉。

丹平丹年很可爱，读“拇指姑娘”很有兴趣，她们对我们的困境毫无知觉，自得其乐。我很耽心丹年手腕穿得太薄，想给她把毛衣袖子加长又无时间，心里有点难受。

我赶着时间回到厂里，参加了下午的劳动，担了四十五斤焦煤到红专，然后就烤火。因为担得不重，汗水出得少，不致增加病。大家对我送廖回家有意见，觉得我们的关系不正常。我觉得是误解。大家对廖更有意见。

非常盼望放假，好回家同铭勋聚会一下，还要同他谈几个问题：1、关于徐某问题，2、平时要勤劳动，注意影响。3、对党忠诚。



1959年1月19日，星期一，气候晴

上午挑焦煤到红专，还挑了一次夹子到石灰窑，中午吃包谷粑。下午挑三连子煤，五趟共305斤。

1959年1月20日，星期二，气候晴

昨天上午先挑铁送红专，后挑煤。下午到大竹林挑瓦，挑得很轻，回来又挑煤。

今天上午我们挑石灰上幺店子，又挑三连子下来，各二次。上坡很吃力，把我弄得很疲乏。下午搬木料上幺店子，是搬家的样子，幺店子搞得很好。

1959年1月22日，星期四，气候阴

从金刚碑过，有糖食店，到厂里去，也从供销社过，一天要眼见糖果饼干数次，眼见嘴馋，很想吃。从21日起是高产周，25日又不能回家了，又只有盼望28日。多难忍耐呀。又想看铭勋，他是改造进展不大，我又没去看他，他的日子比我难。还想丹年，袖子太短，多冷呀，但是也不能去请假。

我对春节总抱着希望。

1959年1月23日，星期五

上午金刚碑挑煤，然后上李子林挑焦，下午李子林挑矿。

晚上开生活会，组长提出来，郭老师也提出来表扬了几个人，我受了批评，1、劳动进展不大，2、劳动时不应看小说。3、买饼干吃。第三是误会，解释了就算了。第二我十分心服，第一需要从思想上检查，努力改正。

明后天是高产日，好好干一下，不要怕痛，脚痛头痛是小事，必须经过这一关。

高产周结束，可能回家，我多高兴呀。

1959年1月25日，星期日

我总对自己受批评的事想不通，觉得受了委屈。我首先感到诧异，自从鉴定以后，我在劳动方面情绪比过去高涨，跑得快，挑得重，自己问心无愧，为什么反而受批评呢？但是又想到我来时挑四十多斤，现在挑五十斤，还不如老年人，进展不大，这也是事实。郭老师说的干劲倒也没什么。这有什么不合事实的呢？心里觉得好过一些。走一会儿又想到这一定是由组长对我有成见，老觉得我挑得少，而不注意到我挑了几次七十斤，经常挑六十斤。但又想到组长掌握的情况是全面的，我自己又缺乏跃进思想，对劳动中有些东西还体会不到，特别想到过去对三反问题党对我进行过多次教育，我都没听进去，直到反右以后才回想起来，现在党见到我不对就提出来，这是趁早教育我。想是这样想了，可“委屈”的情绪总去不掉，眼泪水老想涌出来，鼻子发酸。昨下午情绪又稍稳定一点，冒雨劳动。晚上累极了，腿发酸，右腿不能下地，实在困难，但自己想了一下，不请假，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思想通畅。

今天上午正想请假去看病，又想到高产日不应该缺勤。组长布置我和何启超在家搞宣传布置工作，我趁此机会又向郭老师作了口头汇报。1、对批评的看法及思想斗争过程。2、铭勋近况。3、身体情况请假。郭老师教我要抓思想。

我全身发肿，下午头痛。头发闷。白带多，肚子胀。等等。医生是个老头，看来很有经验，但他说是慢性肾脏炎我却不大相信，药立即煎来吃了，看是否有效。

晚上开会，评比马上开始了。

1959年1月28日，星期三，气候晴

作好宣传布置工作，迎接省委检查团。

工作进展较慢，一个下午加上夜班，才完成了（专栏中的）“共产主义园地”。这样坐着工作，总免不了要想到大家。我有一个很坏的想法，廖给我提出意见，说我不应当随便背后议论人，我看她很生气，我也感到很抱歉，因为我实在没替别人考虑。她强调指出我这种议论背后隐藏着不良动机，我检查自己确是不顾别人，是否有诽谤她的名誉那种想法？又实在没有。我想，今后无论怎样，不在背后去议论人。我的不好的想法是：她也会在背后去议论我。根据过去的经验，她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会这样做的。但是，我总觉得自己这样去揣想是很不对的，管她怎样，我一定坚决改正这种作法。

前晚加夜班，郭老师没有叫我去休息，我怀疑他根本不相信我生病，我正有这样的顾虑，怕人家说我受了批评想不通装病，因此有时即使支持不住了也没说出来。

但是，郭老师批评我劳动不积极，我自己又觉得是尽了力的。我想应当相信党，可是自己亲身的感受确是客观存在，我到底应该怎样想呢？究竟党有没有做错说错的事呢？总得不到解决。很苦闷。

老肖说，单纯些，少想些个人主义！对的，可是做不到呀！

我觉得改造太难了。

1959年1月30日，星期五，气候阴

每夜都搞到十二点以后，白天也没有休息，今天已是第四天了。虽然不如挑担子那样费力，但我也感到疲乏得很，昏昏然，飘飘然。这是一次考验，一到深夜我就总想睡觉了。我感到自己可耻，坐着加班都支持不住了吗！

想家，想家，哪天能回去？

1959年2月3日，星期一，气候晴

昨夜没加夜班，我打算彻底盥洗一下，惜乎没有水，井里只有一点灰色水。我只洗了脚和衣服。陈敬维回家看病，主动代我带钱。今天中午他就回来了，带来三元钱，一盒“维尔肤”，和铭勋写的条子。卅日发给我的信为什么没收到呢？午饭后我立即到疗养院去查看，反复盘问，才知道在我们苦战的那几天，张同志找不到人，把信退回去了。我很气恼，但这也怨不得谁，只不过太凑巧了。从十一月起，足足三个月了，没有和铭勋从容不迫谈谈心，总有那么一些客观原因来凑巧，我很想念他了。听陈说他很耽心我。今晚回来看见传达室有电话，马上想去给他打电话，但转念一想，要和他划清界限，这么亲密是不对的，就没去打。

1959年2月8日，星期日，气候雨丝

（除夕不允许右派们回家，让他们评比，互提意见，邝忠龄气哭了）

今天是春节，从昨夜起，我们就在过节了。

前晚回家了，很多天来我很想念铭勋同孩子，回家后母亲又想同我多谈，也没能同铭勋畅谈，心里有点歉然，早上走得早，还有些恋恋。

昨夜除夕晚会。半途郭老师叫我，廖，三个组长，老汪，到他房里去谈话，分析了我们所犯的错误和近来的一些情况。前天我们没吃晚饭就走了，昨天来了又没去吃早饭（不和集体在一起吃饭是犯错误）。

昨天评比，我是第三名（应为“第三等”）。对于廖所提的意见，我很不冷静，哭起来了，这很不好。伤心的是什么呢？觉得她歪曲事实，把我丑化了，丢了面子，多丑的思想！

1959年2月11日，星期三，气候阴

评比已经结束，我是第三等，不大好，问题在于：1、思想抓得不紧，2、劳动干劲不足，3、政治学习不努力。在群众面前，什么思想也瞒不住人。的确如此！我对自己感到伤脑筋，为什么老不长进呢？二月份无论如何，要在这三方面有显著改进。

那天廖给我提了意见，我哭了场，很不对，这就是用个人主义态度来对待评比。我认为她的意见中，说我自由主义影响团结是提得很对的，举例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没什么关系。说我对领导有什么抵触情绪是不确实的，我没那种思想，而且相反的，我非常拥护和热爱郭老师的一切。使我激动的，也正是这一点。现在我对廖有无情绪呢？有时难免还有点，应克服。我对她还有点意见，觉得她这个人“个人英雄”主义很严重，很要面子，一触及这点，就不择手段，人家说她对我是报复，我看她并非有意报复，但不自觉地在这样做。否则无法解释她的那些过于偏激的话。肖成智说：“一个人对人家提出打击性的意见，也正暴露了他自己。”这话很有道理。不过，我不应当因为她的态度不端正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我是否能够同她开诚布公地谈一次呢？我想应该这样做，但今天我的情绪还不够好，可能会增加她的情绪，还是明天谈吧。

前晚郭老师还带我们去看了电影，影片是“渡江探险”，思想性强而艺术性差，不过我的目的不在影片，而是领会党对我们的关怀（抱着这个目的看电影，是党对他们的要求）。

张某问我为什么避免同他谈话，我答应他找机会谈一谈，我应该向他提出意见（张带有流氓气），也应当正视自己的弱点，把问题弄清楚，但考虑再三，不知道谈什么才好。

修订规划（五九年二月份）

一、从15日到28日（13天）中间，口头汇报三次，书面汇报一次。第一次把这次评比的思想斗争情况报告给党。

二、劳动以六十斤为起码数，天雨，上坡，疲倦，决不低于此数，争取放八十斤卫星。情绪要饱满。不缺勤。

三、努力学习，每天读报，把指定文件学完，阅读红旗，中国青年。（订二季度书报）

四、平时不吃零食，克服想吃的习惯。

1959年2月14日，星期六，气候晴

写完日记，廖睡醒了，她主动找我谈。一瞬间我心里确定了要正确地对待人，不要带个人情绪。我们很快便达到了相互了解，诚恳地提出意见。

十二日上午多数人都是按时回来的，我和廖也是按照郭老师的话，吃了午饭才走。事不凑巧，饭后又要听报告，我一面听一面很着急，巴不得快点讲完。两点钟才走了。一面走一面想，今年的任务这样重，恐怕要多加夜班，得作好苦战的思想准备。

铭勋的思想开朗得多了，不过，在生活方面他还按部就班的，清清洁洁，有秩序，我对他说他的这种想法跟不上形势发展了。今天回厂，他送我一程。

评比除：1、思想改造，2、劳动态度，3、政治学习，4、组织纪律，5、清洁卫生，6、爱护公物，7、互相监督，8、思想汇报外，还加上9、合理化建议，10、服从领导。每人每月公开思想三篇，表扬与评比五篇。

丹年上小学的问题如何解决？

今下午家属开会的时候，宣传了叫小孩不到我家里来闹的问题，不管效果如何，这也说明党的细致负责。

（丹年的幼年记忆中，家门口不时地有小孩和学生聚集，有时是邻居小孩和附小的小学生起哄胡闹，有时是西师的大学生高呼“右派分子孙铭勋必须交代罪行！”一次丹年从外面回家，见一群大学生站在门外喊口号、提抗议，家门是关着的，此时母亲打开门用普通话对他们说：“你们的意见很不成熟，等以后考虑成熟了再来吧！”态度很和蔼，很文雅。那些学生注视着母亲，表情有些困惑，都不说话，然后慢慢地散开了。）

1959年2月15日，星期日，气候阴雨

下着小雨，路有点滑，我担得比平时重，可是心情愉快，也不觉得怎样了不起的困难。

晚上开会，讨论关于“粮食定量”和“糯米胡豆”问题。大家一致对王抒情很气愤。郭老师说的话句句是苦口婆心，并且非常形象生动。

1959年2月16日，星期一，气候雨

整天都下着断断续续的雨，我不管路滑，总担得较重，不过跑得不快，可不可以再加快一点呢？明天试试看。

晚上没学习，洗了脚就烤衣服，我想抓紧时间去汇报。但是郭老师生了病，接连几个人汇报，他累了，只好改时间。

不知道铭勋在家里怎样过的，有点挂念。我希望他能快点改造好，而且心情愉快。

我想写张批评，批评李某，又想写建议，建议把事务工作分散一些。

1959年2月17日，星期二，气候雨

上午淅沥淅沥下雨，我们没去运输，在家里开会。大家相互提些意见，又讨论了有关点名、和什么是正确的劳动态度。又明确一些问题。我本想不提对李某的意见，觉得拉不下情面，结合想了一下，还是说出来了。老董还说我、曹、赵在评比以后有进步。可惜后来没把劳动态度的问题讨论充分。

下午到李子林两趟，路滑，人疲乏，我觉得累得很，支持不了。心里又觉得那次受批评真是委屈，但立刻想到这是错的，把它消掉了。

从男的口中反映出来，他们背了我们开玩笑，说了很多放肆的话，我们就从来没乱说过。

1959年2月19日，星期四，气候微晴

一连下了三天三夜的细雨，偏偏又走的是李子林，真是缙云山都爬遍了，路也走烂了，今天是晴天，使人心喜，可是昨夜真冷，幸亏昨天廖给我带了一床薄被来，否则不知如何过关。天亮起来，发现喉咙痛，有痰糊着，吐出来是黄色浓痰。下午浑身骨痛，头痛，发寒热，发烧等现象都齐备了。夜间加班领导上照顾叫不去，我就没去。

昨夜突然开会，郭老师抽问学习情况，王抒情和张正东出了丑（“出丑”是指没能回忆文件的详细内容），其实我也记不起文件内容了，很怕抽到我，侥幸没抽到，刘又辛和曹慕凡谈得较好。郭老师要大家今天写一张关于“批判个人主义”的文字贴在学习园地里。我今天上午运输紧张，差点没能完成任务，只剩四十分钟了，有人说可以不必去担了，谭古诗也叫我不去了，但是我想，不要放过这一次，斗争结果，还是去，一点过十五分，终于把它运回来了。赵彦青和杨宗义等着我一道。虽然累，精神却愉快。但“写”的任务没法完成。下午抖擞精神，开快车，在三次休息时间，共二十分钟，就写好了。人是真疲乏了，最后一趟几乎担不回来。

郭老师病好了一些，又去加夜班去了，我又汇报不成。

生了病，想休息。想一想，还是不要姑息自己，明天一定照常劳动。

我自愿担任了发行报刊的工作，一定要做好。

怎样参加“批判个人主义”呢？我向党提出了保证：

- 1、认真学习文件，边读边想，读完概括总结。
- 2、联系自己思想，批判它。（过去及现在）
- 3、开会专心听，自己也有准备，积极发言，不睡，思想不开小差。
- 4、系统全面地批判，讨论实践，写成书面。

1959年2月20日，星期五，气候微雨

夜里发寒热，喉痛加剧，思想斗争也加剧，几乎决定今天请假，又想向郭老师汇报，一面却又准备了劳动穿的东西，以安慰自己的良心。今晨廖肖都劝我去请假（但并未请假）。今天上下午都完成了劳动任务，都在六十斤以上，病状并未恶化，总算坚持下来了，可见有病不一定非休息不可。

早上郭老师宣布今晚是自由活动，我就作了种种打算：洗衣、打毛线、读报、看书、写日记、搞发行工作……可是晚饭后我们正把冻透了的脚伸到滚热的水里去烫时，郭老师又叫值日吹哨子集合。我听见他在宣布加夜班，带工具，心里就不高兴，一面嘴里答应“来了”，却舍不得把脚提起来，懒懒地收拾了东西，穿了湿袜，扛上扁担箩筐，大家都笑我们，我才知道是去看电影。我不想去看，但觉得党真正关心我们的生活，又衷心愿去。

明天打牙祭，后天放假，我很想回去，一是想吃汤圆腊肉，二是想同铭勋谈谈，三为了想看丹年丹平。

1959年2月21日，星期六，气候晴

我作汇报。郭老师作了很详尽的指示，叫我彻底批判个人主义，积极劳动，在政治上互相帮助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努力学习，在会上多发言，普遍考虑提意见，准备二月份的评比……

下午大家去运河担焦煤，领导上照顾我和肖，叫我们去幺店子担烧煤，我们就提前上班，五点多就完成了两趟任务，赶紧吃了饭去接他们，十点钟才回来，心身愉快。

郭老师说有些人对放假考虑得太多，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真盼望后天放假回家。说要树立以厂为家的思想，我树立不起来。

1959年2月22日，星期日，气候微雨

明天放不成假了，很失望。但是为了完成炼铁任务，我不觉得难过。上午我挑了焦煤后，又挑了五次石灰石。下午拉板车，这是一件新鲜事，费力，然而愉快。

今晚看电影“红霞”，红霞考虑问题首先从革命利益、群众利益出发，我怎样能够做到这点呢？比如说，去看电影，我立刻就想到可以回家去拿伙食钱，是顺路。当郭老师不准以后，才想到对集体有影响，大家都想回去，也都顺路呀。

1959年2月24日，星期二，气候雨

昨天任务艰巨，倒没有想到休假的事。上午在金刚碑河边挑焦煤，下午到新煤洞，路远，担得重，又上坡，实在累极了。晚上七点廿分才到厂，经过高炉时，两大炉都停火，我立刻感到可以松一口气。当时我就对同路的赵彦青暴露了我这种个人主义思想，我觉得很不易根绝这一类思想，它非常诱人，而且顽强。

昨夜批评了汪，我觉得自己应该警戒，他总想回家，不放星期他就思想抵触。我也是爱回家的，这次我没象他那样，以后还要更少想个人的事。

我这个月评上二等了，有些高兴，又有点惭愧，下月一定争取一等。

1959年2月26日，星期四，气候晴

昨上午郭老师叫一半人到温泉休整，其中有我们三个女的。我们洗了澡，洗了衣服，就坐在椅子上，不许吃东西，也没什么事做，河面冷风吹来，使人打寒噤（名为休整，实则如受处罚）。没什么乐趣，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等着到了十二点过，才回到厂里。

下午我整理“建议”，廖整理墙报，肖月经来了，都没去上班，男同胞们很有意见，我也不管他们说些什么。

杨宗义给廖提意见，我觉得不对，给他解释了，他仍然坚持。廖也不冷静，觉得受了委屈，差点发脾气。

1959年2月28日，星期六，气候晴

评比条件：

一、思想改造：大胆暴露错误思想，有批判。对过去罪恶深入一步批判，依靠党，对党无话不说，依靠群众监督，进一步批判罪行，严格要求自己，搞臭个人主义。

二、劳动态度：树立正确态度，积极带头干，只准搞好，不准搞坏。任何情况下不讲条件，有创造性的劳动，互相团结。

三、政治学习：认真，深入，细致，联系实际。

四、组织纪律：服从领导。

五、清洁卫生

六、爱护公物

七、互相监督

八、向社员学习，接受监督。

查立场观点

一等：

- 1、干劲大，一贯积极，任何劳动不讲价钱，不讲怪话
- 2、大胆暴露思想，有批判
- 3、政治学习好
- 4、服从领导好

1959年3月5日，星期四，气候阴

一号晚上吃过饭我们就出发向文星场后丰岩去运焦煤，大家本来很疲乏，又爬这样高的山，更累，走到文星场我觉得一步也走不动了，就坐在街边石头上打起瞌睡来。后来郭老师让大家到茶馆休息，我坐在椅子上又打瞌睡，人家来找我说话我也叫他别打岔。主人说我坐的地方有过堂风，叫我换一个地方，坐到郭老师他们里面去，美美的睡了一会儿又走。到了后丰岩，遍地红红的火光，十里外就望得见红了半边天，真是名不虚传的火焰山。找不到厂里的人，我们就坐在焦煤炉旁休息，我又睡着了。郭老师来把我们叫醒，用平车运焦煤到戴家沟去。没东西装煤，绳子又捆不牢，边走边收拾，走两分钟倒停上十分钟，从三点钟直到大天白亮七点多钟才回程，真是疲乏透顶，只想睡觉。早餐的花卷、糯米饭我都无心吃它。上午同肖成智一起，徐中潭不要我们，我们给郭老师当飞蛾（在板车两侧拉绳），重量全都压在郭老师身上，但我们两个也很吃力，跑不快，大家在休息的时候都笑我们，尤其是老肖，人矮腿短，郭老师慢慢走，她在旁边开小步跑。可是，不管怎样困难，我们都非常愉快，兴奋，因为我们同郭老师一起拉车。下坡的时候，真好像在飞一样。老肖没办法，把绳子扔掉，远远的落在后面。到晚八点多钟，劳动才结束，大家都愉快而疲乏地去吃饭。后丰岩同戴家沟的餐厅都搞得不好。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好笑，是那天中午，我们装了卡车后，我打算坐下来等宣布“休息”，我就选择一处好地方睡一睡，谁知道一坐下来就睡着了，软风拂面，异常舒服。醒来后迷迷糊糊听见有社里的干部叫我们起来拉车，郭老师说我们很辛苦，让我们多休息一会儿，我又睡了一会儿，郭老师才叫我起来。

我们住的旅馆很蹩脚，很脏，看样子对我们女的还是特殊待遇，否则更不堪设想。照习惯我睡不着，可是那天一倒下就睡着了。

又想回家了，想铭勋，母亲，丹年，丹平。

1959年3月7日，星期六，气候晴

今天是高产日，苦战一天，运三次矿石，为“三八”节的休息作准备。非常紧张，我觉得自己又经历了一次考验，又累又晚，思想上剧烈斗争以后，终于把第三趟拿下山来了。

我吃了工具不好的亏，在天府把扁担箩筐都搞丢了，今天捡大家挑剩的一对大秧篮，又挑得重，走得急，把体力也消耗尽了，一点钟才吃午饭，只挑了一趟零三分之一。中午为订杂志又耽搁了一个钟头，结果下午六点钟时我还得上缙云寺去挑最后一担。我想原谅自己体力差，工具坏，又订杂志，不去了，希望组长叫我不去，结果组长没说什么。我去了，但计算时间，觉得不够，老肖劝我分陈敬维的（意为从陈的箩筐里分些出来作为自己的），看见我的人都耽心我。胥本馨又说有豹子老虎，我害怕起来了，觉得受了委屈似的，想想怪不着

别人，不应该原谅自己，高产日，别人还挑四趟，我却三趟都完不成，太不应该了，再累再晚也不能阻挡我。结果去了，徐中潭又来接我。七点过点就回到厂里。郭老师也很关心。

晚上自由支配时间，读了“青春之歌不可否定”、“正确估价曹操”。想回家。

1959年3月10日，星期二，气候阴

八号锤石灰石，男同胞锤矿石，砍焦煤。虽然我们这个吃力些，但干净些，我以为是领导上有意照顾的。坐久了腰疼，磨皮擦痒的，大家都说还不如要扁担自由。但在七号之后来坐一天，却是十分合适的。

盼望放假，晚饭吃得特别快，回宿舍也特别快，郭老师也看出这点来了，但他沉着气，不到时间不宣布放假，直等到大家把脚洗完毕，才叫值日集合，听见这一声，大家情不自禁地乐得笑出了声。

回到家里，光只两孩在家，满屋乱七八糟，玩得很起劲。我带她们上街去吃汤圆，本想避开人们的注意，但丹年的美丽，丹平的有趣，又都很活泼，很快活，引起众人注意，捎带也注意了我这位妈妈。九点三十五分吃完汤圆，心满意足地回家了。在街灯底下，一边走路，丹年一边教我跳采棉舞，两个都很乖，最后上山时我背了丹平一段路，觉得不大吃力。

铭勋很烦恼，为丹年回家迟了一点大发脾气，愤怒得快要爆炸似的。我觉得这样做很没有必要，对小孩尤其不好，提高来说还是一个思想、观点的问题。（邝忠龄的思想改造任务中，包括“帮助孙铭勋改造思想”这一条）我觉得他应该要求自己严格一些。但他中午谈到“不但对党无话不说，更要无话不听”。我觉得这是他的进步，不但是理论上，而且是感情上的变化。他说到身体不好时，联想到自己过去多年来思想没空过，老是背思想包袱，耽着心事。当时我没话说，后来想到，这就是个人主义在作怪，欲望多，患得患失，老是放不下心。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又生活在一起。”言下十分感慨。我也这样希望，能多照顾他一些。但目前还不是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将来也不一定以这个问题为生活的最高准则，我觉得过去这种人生观是彻底破产了。

铭勋的虚弱症，最近又严重了，我很不放心。

六点之前，一家人齐聚了，可惜我要走了。

晚上民主生活会，我第一个发了言。我应该作思想汇报了。

1959年3月13日，星期五，气候阴

这几天都是修拖路，这是另一种劳动，与箩筐扁担的风味完全不相同，时间过得异常慢，不像挑担子那么光害怕时间快。好久没用锄头了，现在拿起锄头，觉得轻了些。写了两天标语，修了两天路。

丢失了三块钱。

1959年3月15日，星期日，气候小雨

今天早上打牙祭，我把肉留起来晚上好吃面。这种事本来不值得记在日记上，可是因为好久没打牙祭，这种生活也会一去不复返，将来回想一下，也是很有意思的。我想，将来的小孩听说我们曾经一个月吃一次肉，会不能理解（母亲没有想到，后来孩子们也长期陷入饥荒之中，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彻底结束挨饿，但饥饿的感觉却久久缠绕，伴随终身）。

给铭勋写了一封信，望给钱，也劝告他，是昨早上发的，估计今天可以收到。

从昨天开始，我们转为修通李子林的便车道了，这个工程比滑拖路复杂。

1959年3月17日，星期二，气候阴

仍旧是修小公路，这种活比挑担子轻得多，可是拿得起放不下，很快就感到疲乏了，浑身无力。

还是没找到机会向郭老师汇报。

心里总在挂念家里，各方面的事务都没接头好，孩子和铭勋的生活困难很多，我是鞭长不及马腹，照顾不了他们。几时能够摘掉这顶臭帽子呢？

1959年3月18日，星期三，气候小晴

今天轮到我值日，如果我有老汪那样大的力气，只要十多分钟就可以担一挑水，就可以留很多时间做自己的活了。可是我花了两个多钟头来挑水。

意外地看见铭勋在大门口，我很高兴，但他却毫无亲切之感（因长期处于作检讨、被批判、遭围攻、敌视的状态之中，兼之体弱病痛的折磨，已经不会“亲切”了），从神色上看来就拒人于千里之外，开口就对我发了气，还说我：“反正麻烦不到你。”我也生气了，但想到他这样远来看我，忍住了。他提出很多困难，我一时也感到困难很大，生活黯然失色，情绪动摇起来。

1959年3月22日，星期日，气候晴

天天都是修小公路，情绪尚好，干劲不算很足。和胡子俊争论了几句，起初我觉得他很讨厌，后来想想，这还是我接受意见的态度成问题。

21日夜九时后回家，西师不供应家庭用电，全家都已经睡了，只有母亲还在洗头发。母亲和我谈谈说说，十一点多才睡（母亲即将动身去湖北）。想到她为我耽心，操劳，我犯错误，害她受连累，我觉得很难，流了泪；她说到儿女之中，我最弱，需要她多照顾，她进退总不放心，也流了泪。

感冒，头晕肢软，还熬了点药吃。和铭勋谈妥了，他放下了顾虑。我更安心。

丹平的毛衣破了，赶时间织补。结果回厂迟到了十二分钟。铭勋送我在路上错过了，也没时间去找他，我心里很牵挂，又怕他着急，但无可奈何。

1959年3月24日，星期二，气候晴

冷书记传达区四级干部会议的报告

张书记报告

（一）半年来公社工作的估价：去秋搭架子来，取得不少成绩，四川省57年4百多亿斤，58年8百多亿斤，增一倍。工业总产值钢70万吨，铁80万吨，产量高，58年工农业都跃进，尤其在干旱年头。文教事业也跃进。这年成立公社在国际上有其历史意义。

1、集体所有制扩大了提高了。财贸下放，社办工业，有国家投资、有全民性，铁的售价及调配由国家。

2、统一领导了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推动了农林牧副渔多种经济发展，我社有专业队，合作社就做不到。

3、组织了几百万人投入全民炼钢运动，公社一大二公，才可能调动人，完成四秋任务，小春任务。

4、实行半工资半供给制后，对农民生活有了保障，实现了农民的愿望，吃饭不要钱，绝大多数农民增加了收入，游书记过去是老上中农，增 49%，王厂长的哥增 100%。

5、整社，干部作风转变，干群关系逐步好转，食堂、托儿所受重视，建立了生产责任制，五定，专人带职，初步改进了无人负责状态。完成了 58 年分配任务，用评奖金方式决算。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下放到生产队。

6、公社为国家完成了统购任务，民兵建立，征兵制。

7、积极作了春耕准备工作，做了大面积高产地，执行八字宪法，三五运动，如农机厂。

8、文教事业有发展，扫盲工作坚持下来了，基本消灭文盲，（有起伏）举办生活福利事业，妇女得到解放，敬老院使孤老有依靠。

9、改变农村落后习惯，树立新风气。妇女在经济上与男社员平等，改变封建观念，轻视妇女、打牌酗酒、游手好闲、根绝。偷盗减少，军事化培养组织性，互助协作精神成长。干部种试验田，干群关系更好，干部深入工作，更好地领导生产，开阔眼界，提高觉悟，对群众疾苦更有体会。统一使用劳动力。

这些成绩的得来，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指出方向，全体干部与社员的努力。

当然也有缺点，主要是没经验，干部作风还需要改进，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手指头与一个指头比。

（二）当前公社的主要矛盾：

1、粮食问题。80% 的公社增产。但有的地方征粮工作没做好，或瞒产。也有浪费现象，红苕没挖完，敞开肚子吃，喂猪等。

2、社员对公社财产关心不够。

3、社员生产情绪有问题，60% 干劲不大。有个别人说怪话。中小学生放学后少参加劳动。脱产干部较多。

a、主要是所有制的转变有些突然，农民的私有财产不能无偿地占有，应该有个过程。

b、小集体所有制转为大集体所有制要有强大的经济力量作基础。

c、农民觉悟还不够高，劳力多人口少（的家庭）总觉得不划算，权力过分集中，没充分体

现按劳分配的原则，社员的积极性不能很好发挥。社员的主人翁感也不够，有事找公社。

（三）党中央研究了情况，提出十四句话巩固公社：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物资劳动，等价交换，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主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按劳分配的原则。

八大好处：

1、社员干劲就会大，保证了 59 年大跃进，都想把自己的队搞好，自然会展开竞赛。

2、可以挖潜力，非生产人力尽力减少，大闹技术革命。

3、公社能更好地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

4、社员能更好地爱护公物。

5、生产积累会增加。

- 6、多种经济发展，工资与供给制才能保证。
- 7、队的权力扩大了，社员主人翁感加强。
- 8、事务性工作减少，领导干部才能参加劳动，才能更好领导生产。

今天上午把书面汇报交了，同时作了口头汇报，郭老师立刻看了，他指出：

(1) 学习抓得不紧，(2) 到温泉去洗不洗澡是只凭兴趣，没好好领会领导的意图，(3) 二月份的规划是否完全做到了呢？不一定。 (4) 晚上门要关好。

1959年3月26日，星期四，气候阴

一连几个大晴天，工地上工作很热，这还在其次，旱象已证实，连煮饭的水也成问题了。地里的庄稼渴着盼雨呢。累得很，浑身到处酸痛，肋骨痛得不好换气。但情绪尚好。

昨下午太阳把头晒晕了，不想说话，才听见第一组的人叽叽喳喳说下流话，其中以张某、成某为甚，使人很讨厌。过后一看见他们，我就想起那些话，抑制不住厌恶的心情。廖说这是资产阶级的文明，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我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说下流话的。

不知道孩子们在幼儿园怎样，铭勋一个人在家又怎样。

1959年4月1日，星期二，气候阴

评比也已结束，昨晚大家把思想汇报也写好了，我早就写好，看小说，还挨了批评，郭老师说：“政治书籍都没学好，看小说不好。”

心里挂牵母亲，不知她在路上遇到麻烦没有。也挂念铭勋和孩子，五号是不是放假呢？

1959年4月7日，星期二 气候晴

我鼓起勇气，把在工地上听到的下流话反映给郭老师了，当然没说出是些什么话。郭老师说应该展开批评。于是晚上我在民主生活会上提出来。第二天我发现有些人对我态度有些不自然，晚上就有人给我提意见，特别是胡某，报复手段，要把我过去的资产阶级作风书面报告给郭老师。当下就引起了群众的驳斥，和郭老师的批评。不过我也还是很不愉快，怕他对郭老师胡说八道。

1959年4月9日，星期四，气候晴

照常修公路，但连日睡眠不足，疲倦已极。昨夜江边起焦煤。

应该思想汇报了，又是找不到机会。
但愿又放一次假，让我回去看看丹平丹年。

1959年4月15日，星期三，气候小晴

最近生产任务非常紧张，几乎是每天加夜班，有一次苦战通宵。人是感到非常疲乏，但是我想这个“苦战”时期

- 一，改造的收获与问题：
 - 1、对党的不满，个人愿望的地位
 - 2、对孙的态度

- 3、人生观，生活作风，劳动态度，政治学习
- 二、对党的态度，相信、信任、依靠、亲切，否则错误
- 三、对公社、西藏、苦战、帽子
- 四、（未记完…… ……）

1959年4月17日，星期五，气候雨

一、改造的收获与问题：

1、对党的态度。怀疑、不信任、疏远、信任，亲近。（一系列的照顾，一贯制，不前不后，不入党。）

对孙的态度。

认罪服输，劳动后，认识到自己过去不识好歹，不劳而获，理所应得，贪得无厌。不听党的话、犯错误、工作损失、不加强思想改造、不杜渐防微。

2、处处为个人打算，个人小天地，反映在劳动态度，政治学习，生活作风上，关键在劳动与学习，（无武器）

二、对目前形势的看法

1、公社，苦战，有点全局观点，怕艰苦，通宵坚持就是胜利，见出铁。

2、帽子，望早摘，不虚度目前这极宝贵的时间，家庭

3、西藏

黎万燧提的意见：穿着讲究，皮鞋，香水，零食，太太小姐作风，不像劳动人民，改造中应注意这个问题。

1、第三组评比时廖估吃霸贓，三个女的互相包庇。

2、黎万燧的批评提供了线索

3、说李捧领导，觉得和廖难于相处，太主观了

4、和张正东的隔阂

5、关于小孩度星期日的问题（周日丹年丹平在幼儿园无人接、无人管），依靠党来解决。

今晚郭老师宣布撤销李某的组长及生活的职务。今晚的民主生活会开得很激烈，有人提出廖是否拍郭老师的马屁的问题，引起争论，廖不冷静，但较过去进步。

1959年4月20日，星期一，气候晴

自从连续苦战以来，忙得连日记也没写。

一个月没回家了，非常想回去，特别想念丹年丹平，前几天一想起她们在幼儿园没人接她们回家，我想，像她们那种无知的样子，不懂得大人为什么厌烦她们，只是呆呆地看着，感到惶惑，我便忍不住伤心。这都怪我和铭勋犯了错误，连累她们受罪。

1959年4月24日，星期五，气候晴

廿七、廿八两天晚上评比，廿九如果不加班，自由掌握，卅、一日写思想小结，遇加班顺延。

（郭老师批评大家）劳动一般保持中间状态，缺乏干劲，想快点通车是好的，但质量不够，缺主人翁思想。不是光批评，改了缺点就好了，不必抬得太高，摔死了不好。学习抓得不紧，没好好利用中午，思想也不很集中，很少人汇报，思想有公式化现象，不能对党

忠心耿耿，有些人不敢批评，也有人记小心眼，不批评就是个人主义（点了曹慕凡的名），也不肯暴露思想。

（当时曹慕樊已经五十岁出头了，体弱，高度近视。1940年代他曾在梁漱溟创办的勉仁学院工作，非常崇敬梁漱溟，具有民主政治理想。对中共在建政前后的言行，了解也很清楚。20多年后他曾对丹年说：当了右派，劳改时叫他交代“为什么不相信共产党”，他回答：“正相反，不是不相信，恰恰是太相信了，你们过去说过的话，我都记得很清楚。”在这个劳改队里，他的政治认识是最深刻的。后来在“文革”时期，曹慕樊被造反派用皮带抽打，皮带的铜扣抽在眼睛上，一只眼睛从此视力模糊，近于失明。）

资本主义思想小家庭是温暖的，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庭才是温暖的，那种骑在人民头上，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光想摘帽子，又有什么用。

近来因为灯油不多，晚上不点灯，很少写日记，很多事情都忘了。廿一下午回家，第二天晨早回厂。铭勋生活尚好，可惜没见到丹年丹平。

1959年4月28日，星期二，气候晴

晚上没灯，日记也写不成了。前晚收铭勋一信，我不知道他也想和我谈谈。我还以为他不想谈话呢。以后回家，一是照顾孩子，二希望他谈谈心里话。

非常想念孩子，而且一想到她们便想哭。前晚讨论“如何树立共产主义的生活目的”时才真正克服了这一思想。

真盼望早点摘帽子，即使不能同铭勋一道，也可以使孩子的生活过得好一点。

1959年5月1日，星期五，气候阴

很久不下雨了，天天盼望，老是火辣辣的太阳，头都晒晕了。近来精力很不支，但也不畏惧什么，心情倒是愉快的。

1959年5月14日，星期四，气候初晴

去李子林修梭槽，从五号起便是绵绵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迫不得已必须上班，又是红五月，如果躲雨，又躲到何时为止？脚踩稀泥，头戴草帽，身上湿透，浑身泥浆，很不好受，似乎心里也和天气一样烦闷。加上劳动时间长，好不容易盼到了下班时间，却不得不下班，我的身体又不舒服，天天下午头痛，头昏，发烧，四肢无力得像棉花一样，有时心里颤抖。总起来形成一个印象：“苦战不休”。早出晚归又忙又累，我很不喜欢这个工程，盼望快些修完。

十一日晚放假，本来我整天都在盼望这个假，连包袱都收拾好了，可是临走时我招呼人同道走，郭老师却叫我不走，他说去接小孩，对小孩对幼儿园都不利（认为一个右派份子出现在幼儿园影响不好），不去接又不解决我的问题，要我星期六回去。起初我一时懵住了，后来懂了，高兴得很。十二日假期大家休息，我虽没走，其实也是休息，连担水都是郭老师去叫人担的。我认为这是照顾我休息。

1959年5月25日，星期六，气候晴

从16日早晨起，红专铁厂就宣布停办了，我不管这些，照郭老师预定的回家去了。在街上用电话通知了幼儿园，午后一时，两孩回来了，立刻穿上新鞋，看好新书，高兴得午觉都

睡不着。我煮汤，洗被，然后把她们叫起来上街去照相。她们一看见江水便要求下河滩去玩，玩个尽兴，吃点饭，就回家来了。这次回家，洗了两床被和铭勋的脏衣服，孩子也心满意足，只可惜铭勋不在家。

我当生活（生活组长）工作很多，老肖给我提意见，说我处理问题时很少考虑维护集体利益的原则。

我的学习还是不见好，非学完人代会报告和西藏问题不可。

1959年5月25日母女合影

一连栽了六天中稻，腰痛很厉害，但比去年好些，可以支持。我想到郭老师对我的鼓舞，也就是党对我的期望，不能不严格要求自己。我相信自己能够继续坚持下去。谭古诗提出两关一齐过的问题，我也开始注意这个问题，究竟作个“非党布尔什维克”是否可能（这是不求实际的要求，近乎欺骗）。



评比检查

思想改造：进一步靠拢党，依靠党，听党的话，严格要求自己。例例汇报，大小事一样，工作中的依靠。搬家的思想情况，为个人打算，克服它。服装

但是对自己要求仍不严格，不自觉。

例：生活，端饭，煮面，退粮票……等

辜负了党和群众对我的信任，党对我的关怀

使我更憎恨自己的错误。例：接孩回家。

劳动：李子林与插秧，较前进步，主要是受党员社员的启发。但做得不够，没更进一步要求多快好省。

组织纪律：生活上不能严格遵守，早晨不学习，晚上爱讲话，爱迟到，生活作风没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吃糖打牙祭，从老汪带馒头又给自己留了后门。破了例。

清洁卫生：互相监督比过去关心一些，不够，没坚持。汇报是因郭老师病，没过去抓得紧，但主要问题仍然及时汇报，具体事情也谈。

明后天把西藏问题学好，写几篇文章 1、学习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认识到党领导是人民胜利的保证，2、表扬成光华服务负责任，值日时自觉工作，买酒。3、近来思想状况。4、建议给伙食团服务。

评比：

- 一、是否大胆暴露思想，认罪服输表现在何处，批判
- 二、劳动态度方面，积极主动肯干，服从调配，虚心向社员学习
- 三、政治理论学习，是否认真踏实
- 四、组织纪律
- 五、互相监督
- 六、思想汇报

1959年5月28日，星期四，气候晴

今天轮到我作值日组长，思想上比较紧张，总算过去了，做得不好也没出错。

想回家的心很切，有点迫不及待的心情，好久不曾有这种情形了。我很挂念铭勋，那天我为了不迟到（没有赶回家去，托人带了信），他在家里等我吃饭，不知道那个人带信带到了没有，我还是觉得自己并没做错，可是对他感到歉然。儿童节以前最好能放假，让我把东西送回去，把丹平丹年打扮起来，一天到晚都在盼望，很难忍耐。

昨天评比，大家给我提出了许多意见，肯定我的工作态度是对的，但账目不清是不好的。

1959年6月11日，星期四，气候晴

转瞬间六月份已过了三分之一了，检查一下，这一个月开始得并不好。主要思想活动就是想回家，起初光想如何使孩子过好儿童节，后来又想和铭勋聚会一下，因为思想集中在这一方面，就放松了改造，不安心劳动，工作也作得不好。学习是更谈不上了。

一、积极准备给孩子过节，给家里交代。怕孙等我，绕回家告诉他别等。但忘了给王长春安排买吃的，“生活”（生活组长）的工作还是限于被动。

二、劳动不安心，杂事较多，有时耽误两小时，有时半天，虽也是做事，可是非生产，自己想算账、画表尽量不占上班时间，本来自己劳动就不好，没过关，我想下半月会少些事。

三、学习总觉得没兴趣，总把它推到一切事的后边，结果就总是挤掉了。

四、对黎万燧的事我不很同意唐季华的意见，我觉得应该多让一个人自觉。

1959年6月13日，星期六，气候阴雨

晚饭之前，薛迪宽（接替郭老师的带队干部）把我们在食堂集合起来，进行了严格的批评，说我们目前改造不踏实，思想涣散，劳动不积极，生活散漫。

星期天又到了，孩子们该又回家了。我这顶臭帽子不知道要戴到什么时候为止？

1959年6月24日，星期三，气候阴雨

母亲回来，再三表示她对铭勋的看法（建议邝忠龄向孙铭勋提出离婚，似乎认为离婚后邝忠龄便可摘帽，全家生活能得到改善），老肖同意她的看法。

1959年7月25日，星期六，气候晴

半年思想总结

在党的教育下我有很大的收获：

（一）对党的关系由半信半疑到坚信不移：

急切盼望摘帽子，存侥幸心理。疑神疑鬼，不相信党的改造政策。听天由命，偶然性。不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汇报思想比较大胆，仅出于理性认识，为了今后不再犯错误，只有依靠党。但情感上不甚亲切，汇报时拘束，只谈问题，不谈感想，不谈生活，不能像对亲人那样无拘无束毫无顾忌地倾谈。思想根源在于不相信党，一贯以为党是不关心人的，特别是对犯错误的人，抱成见，是凭运气生活。现在，由于事实给我的教育，使我认识到党的政策总是根据全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来制定的，如大跃进，苦战与休整相结合，抓生活，近来抗旱，细致体贴，无微不至。对我们的改造也是这样，严，是要我们快改造好，但又对我们十分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我不但从理智上认识到自己错了，而且打心眼里痛感前非，巴不得立刻改造好，想和

党说知心话。因此，目前无论领导上决定什么问题，我总相信是正确的。九月停发工资并未引起思想波动。相信党的安排。

（二）通过劳动，思想感情起了变化：

一年来我们所参加的劳动，虽然比不上社员做的多，劳力也不如社员强，但是和过去的劳动比，过去只不过是在玩，是装门面，现在和真正的劳动群众一样的劳动，首先是感到不容易坚持到下班时间，还要第二天接着……坚持。这是考验，使我深深体会到劳动人民那种勇敢顽强的生活态度的来源，懂得为什么只有剥削阶级才会消极颓废，才会厌倦生活，才会产生种种荒诞不经的幻想和说些空空洞洞的废话，为一个虚字眼争辩得十分有劲。……

小组意见：

优点：

- 1、对党信任有较大进步，靠拢组织，经常主动向党汇报自己的思想。
- 2、生活组长工作耐心，态度好。
- 3、劳动比去年踏实、肯干。
- 4、组织纪律较好。
- 5、对人比较直率，作风正派。

缺点：

- 1、思想改造抓得不够紧，家庭顾虑较大。
- 2、政治理论学习，缺乏兴趣，抓得不紧。
- 3、生活工作有时缺乏原则性。

（未完待续）

中国的“劳动教养”是怎样教养右派的 ——再谈中国的“劳动教养”

作者：佚名

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从始至终都是他一手具体操纵的。当年夏季，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以及稍后的青岛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在反右派运动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就两次谈到了处理右派的办法是：“把右派送去劳动教养。”

虽然以前曾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过，关于要求各地建立劳动教养机构的文件，那只不过是根据“百分比大师”随意推测出来的，面对百分比极小的特定人群的，一般人并不知情。

反右运动中，所谓的“右派”提出了许多关于人治、党治、法治的意见，尽管这些正确意见当时被诬为“向党猖狂进攻”，实际上估计毛也可能有他特别的考虑。因此，在处理为数众多的右派时，一改以往一切均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的惯例，首次出现了处理右派的“法律形式”。那就是从表面上改而为“尊重”《宪法》，用“国家”的名义，继而“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考虑和研究”（1957年8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一

文中的話), 在中国的法律中, 实在找不出“言论罪”、“思想罪”, 最后竟然找出个《宪法》第 100 条。把条文加以篡改, 作为依据, 用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名义, 通过人大的“形式”, 才由刘少奇用“主席令”颁布了一个《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作为处理右派的所谓“法律依据”。

这个《决定》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规”。中共中央也在不同场合一再说明:“……是对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 是一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劳动教养同劳动改造罪犯是有区别的”……

虽说这《决定》是“长期研究”制定的, 实际上谁都明白这是专为收拾右派仓促弄就、漏洞百出的一个文件。因为是匆匆拟定, 这《决定》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他依据的《宪法》(1954 年《宪法》)第 100 条, 其原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遵守劳动纪律, 遵守公共秩序, 尊重社会公德。”那么, 哪个右派违反宪法和法律了? 哪个右派没有遵守劳动纪律? 哪个右派没有遵守公共秩序? 哪个右派不讲社会公德了? 他们仅仅是根据《宪法》第 89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来行使自己的权利(仅仅施行其中一项——“言论自由”, 还是被骗而去“施行”的)。给行使合法权利的公民扣种种帽子, 以镇压的手段阻止公民行使合法权利, 才是真正违反宪法和法律! 他们强行这样做, 只是因为他们有强权而已。

其次, 毛泽东还说:“只要他们不当特务, 不再进行破坏活动, 也给他们一点儿事做。”哪个右派是特务? 谁从事过“特务活动”? 这简直是“帽子大王”的疯话! 40 年代延安整风, 他就毫无根据地随意给王实味扣上叛徒、特务、托派、国民党探子等等帽子。反胡风运动中, 他又给所谓“胡风分子”毫无根据地扣上“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托洛茨基分子、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注 1]他几乎搜集尽、创造尽了世界上这类的词句, 给一切他不满、怀疑的人扣上“莫须有”的大帽子。最后, 他的这些疯话, 被历史证明都是毫无根据的编造和诬陷。在反右运动中, 他又一次玩弄了这一可耻的手法。使用这种手法固然他觉得得心应手, 然而他却全然不想, 在相当数量正直人民的心底, 他已经失去了被敬如神明的伟大领袖形象, 沦为一个疯狂的、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暴君。

《决定》在主要针对右派的第二条中说:“罪行轻微, 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 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 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开除处分, 无生活出路的。”显然, 在这里他又故伎重演, 又在没有事实的情况下编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牵强附会, 含含糊糊地给右派分子扣上了“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等等纯属诬陷的政治大帽子。

《决定》所说的:“需要劳动教养的人, 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 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或者他们委托的机关批准。”这完全是愚弄人民的假话。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声明过, 他是一个“和尚打伞, 无法无天”的人。在处理右派时, 为了扫清那些碍手碍脚的“法规”的羁绊和干扰, 以便从上到下充分按照其主观随意性办事, 给各级负责人创造一种任意使用权力的条件, 才编造了这么一条。这一条的实际内容乃是:“只要单位的书记和负责人说‘你需要实行劳动教养, 就

可以送你去劳动教养”，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而执行机关公安部门则是：“只要单位送，这里就收，反正咱们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所谓的民政部门根本就没有参与这项工作。至于什么“人民委员会或委托机构批准”一说，更是子虚乌有，根本就没有这个机构。

那么，这个《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对右派分子是怎样实行劳动教养的呢？

(一)

1957年底至1958年的4-5月，是集中处理右派的高潮时期，当时，处理右派的单位对毛泽东思想精神下的中央政策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兰州的单位送右派去劳教农场（包括著名的夹边沟农场）时，是由单位的人事干部去送的。[注 2]他们大概认为：对右派是“行政处分”，属于“人民内部问题”，还是自己人。而在天子眼皮底下的北京就不同了，对于右派的处理可以说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意愿。当时的北京，中央、市级机关、团体、企业、学校被划为右派的人有10万之众（时至今日也无法得知或统计到确切的数字，10万之说有少无多）。一批批从单位被公安局带走，实行的是空前大逮捕。分别被送到诸如：草炭子监狱、半步桥第一监狱、地藏庵（炮局）监狱、北郊功德林第二监狱等各个监狱。一进监狱就先收走手表、指甲剪、钥匙、水果折刀一类金属类的用品。三十多人挤在一间监房里，窗户一律铁栅栏封闭，门上只有一个20厘米见方的小洞，是打饭用的，也是巡逻者夜间的窥视孔。就这样没有经过检察院、法院的任何司法程序把人逮捕入狱了，完全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行政处分”，“和劳改罪犯是有区别的”，“也是给了他们人权的”。

在监狱经过一个时期的拘押和集中（半个月到一两个月不等），凑够一大批人之后，将会被武装押运到不同的劳改农场去“劳动教养”。

已经关押在监狱的右派，说不定哪天的深更半夜，突然会把他们叫醒，让他们扛着行李到院子里集合。这批右派站在院子中间，四周楼顶的探照灯一亮，照得院里通明，隐约可以看到楼顶的阴暗处架着机枪，直对着这群手无寸铁的右派。数九寒天，这批右派也不知道是吓的还是冻的，个个瑟瑟发抖，惊恐万状地排好队，被押上一辆辆大汽车。车厢前后都有荷枪实弹的冲锋枪手把着车门。也许是为了掩人耳目，遣送都是在夜深人静，街上行人极少的时候。遣送队伍相当壮观，前有武装摩托开道，后有押解官的武装吉普车断后，如同押解着一批“江洋大盗”，浩浩荡荡，直奔火车站。上了劳动教养“专列”，前后门仍然是冲锋枪手把门，而且还不断地吆喝着：

“不许乱动！”

“不许开窗！”

“不许讲话！”……

车到农场附近的火车站，下车徒步向农场进发，周围又有全副武装的骑兵，马不停蹄地在前后左右打踅巡视，造成一种恐怖气氛。

进了农场，那里是电网、高墙，四方岗楼上有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日夜警戒。这种剥夺了人权的做法就叫做“行政处分”？这难道不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空前的、人数最多的、详细情况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知的现代文字狱？

(二)

住进农场，首先被告知：“给任何人写信，必须一律交到队部，由管教人员审阅后，代为发出；所有‘劳教’人员的来信，先由管教人员拆阅后，再发给本人。”这就是说，接着又剥夺了右派“通信自由”的权利。

安定下来，悬在他们心头的大问题是：究竟要劳动教养到几时？《决定》中说：“劳动的期限也可以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酌情批准。”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机构。

1959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写给刘少奇的一封信里谈到：“……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70%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10%左右是有可能的。”这大概就是劳教没有时限的一个原则——由他随意掌握。他没有点头，《决定》岂敢擅自规定时限？

到了1960年，在北戴河会议上，毛又提出要大抓阶级斗争以后，这个“七年（或者更多时间）”自然就又打水漂了。

时至1962年9月29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的《宣教动态》增刊第63期上作了一个让右派分子们寒心的批示。批示说：“刘、周、邓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自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6-7月间，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付还，查后告我。”这个批语说明，中央上层有人想给右派“甄别”，也是一种对处理右派有看法的反映。岂不知毛的独断专行、反复无常，焉能允许别人作出决断？所以，引得老毛大怒之后，再也没人敢提右派甄别的问题。顺理成章，被劳教的右派分子的劳教时日也就又没个时限了。

1961年，集中在各劳改农场的右派分子们，突然得到农场的通知：“以前劳教的四年不算数了，从现在开始，按新规定劳教有了时限，分为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五种……”这些右派分子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难道也算国家的“法规”？哪个国家能拿“法规”开玩笑？这哪里还有一点儿国家法规的严肃性？哪个国家有坐了四年牢不算数，再重新从头坐起的？哪个国家能拿“法规”来戏弄人折腾人的？

以后的两三年内，确也有极少数右派摘掉了帽子，然而摘和不摘没有太大的区别，摘掉和没摘的依然还在同一农场继续劳动，实际上等于还是继续劳动教养，只不过获得了一个戏谑的称呼——“二劳改”。

一直又拖过了最高教养期（三年）五倍的时间——十五年。到了1978年，毛泽东已经驾鹤西游了，中共中央才终于决定给右派落实“改正”政策，这几十万右派分子竟然被整整劳动教养了二十一个苦难的年头。比《刑法》规定的最高刑期——十五年，还多了六年。二十一年的劳动教养期，按刑期排列，仅仅可以排列在“死刑”、“死缓”、“无期”之后，列为重刑的第四位。这就是中国的“行政处分”？究竟是谁违法？世界历史上哪个国家曾经把“权力”和“法律”戏耍玩弄到如此程度的？

（三）

《决定》的第二条规定：“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按照其劳动成果发给适当的工资；并且可以酌量扣出其一部分工资，作为其家属的赡养费或者本人安家立业的储备金。”

应该说，这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明文规定。右派分子在劳动教养期间，已经是家破人亡，一贫如洗了。这一规定可以作为他们的唯一经济希望。但二十一年来，他们始终搞不清这笔储备金是怎么计算的。每月的伙食费，无论你吃窝窝头管饱，还是一天给你四个糜子面窝头；无论每天给你六个乒乓球大的白薯面窝头，还是一天二两玉米面加野菜的三碗汤；无论每天给你根本不是食品的所谓“代食品”，还是一天三碗白薯粥；奇怪的是都扣除同样的伙食费，价值和价格一律均等。每个月扣除了这昂贵的伙食费之后，剩下的也就能买一条毛巾，一块肥皂。在这种“克扣”条件下，《决定》所说的“赡养费”和“安家立业储备金”究竟积累了多少？经过 50 年了也没有个交代。到底有多少？贪污了多少？还剩多少？国务院说话算不算数？难道国务院也骗人？哪个没有良心者会狠心骗取这群饿殍二十一年的“血汗钱”？

1959-1960 年，农场饿死了一批人（劳教右派），有些人没死也成了饿殍。农场没有条件让他们恢复健康，留在农场必然是“死”路一条，最后决定把他们送回家去“养病”。此时，不但没有什么“赡养费”，什么“储备金”，因为病得不能劳动，连工资也没有了。回到自己破碎的家，还得剥削自己的家人，生活真的是雪上加霜。有的人实在忍受不了生活精神的折磨而自杀了；有的只好再回到农场。在毛泽东的“不给饭吃”的政策下，被逼得主动劳动教养，真是凄惨至极。

1978 年，中共中央给右派落实“改正”政策，不但不补工资，甚至连国务院明文规定的“家属赡养费”和本人的“安家立业储备金”都一文没有了。这笔积累了二十一年的“赡养费”和“安家立业储备金”哪儿去了？是被贪污了？被骗了？没有人说话。堂堂国务院怎么能做出这种赖账的丑事呢？

（四）

1958 年开始对右派劳教时，从年龄上说，除了极其少数 20 岁以下的，年龄较小的是当时的大学生。那时候他们也不过 22-24 岁，其他大部分是中年人，也有少数年龄大的。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二十一年中，他们已经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时正在谈恋爱的，你就是铁鸳鸯，也经不住“左”字号政治大棒的打击，不得不划清界限，各奔东西了。“改正”的时候，二十一年的岁月，把他们都做了无情的转换，当年的青年学生，已经成了近五十岁的准老年人了，中年人也快退休了，老年人也该养老了。对于他们个人来说，紧接着，现实又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安家”，也就是要组织家庭。但客观是无情的，哪里还会有年龄、性格、文化水平、喜好等条件相当的女性会等着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说他们组织了“美满幸福”家庭的，实在是太少了。他们结婚的对象，要么是已婚丧偶，要么是离婚的，和他们结婚的相当多数是为了供养带过来的前夫的孩子。间或也有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结婚的老处女，性格往往有点儿古怪。不管怎样，双方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共同特点是，绝大部分人都已超过了生育年龄。

在这种情况下组织的家庭，可以说，相当一部分家庭，免不了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晚年的精神生活也是凄惨、孤寂、难以对人诉说的。

古代有所谓“宫刑”，可以使人断子绝孙。那么这种具有中国特色断子绝孙效果，无异于鲁迅先生所说的“软刀子”的新式狠毒作法，比起“宫刑”不是高明了许多吗？又该称作什么“刑法”呢？

（五）

在长期的劳动教养中，相当一部分人丢掉了性命。有饿死的、累死的、病死的、触电的、上吊的、投河的、卧轨的、工伤的、意外的……

不论是哪一种死，可以说，如果没有劳动教养，肯定他们不会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这些种种的不幸事件，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应不应该有人负责？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运动的始作俑者和组织不承担任何责任，还转换成了施恩者。当年，借机以害人往上爬的人，爬上去了，没有受到任何行政和道义上的追究和责备。他们依然得势，依然不时闪动着狡诈的目光，又在窥探着动向，又在捕捉新的政治利益。在近百万右派的血肉躯体和血迹中踏来踏去，在数百万亲属的哭号的泪河中，曾经挥拳蹬脚，暗下毒手的打手们也不负责。这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人性、法制？

劳动教养这个行政处分也可以“取人性命”的吗？而且致人死亡也不负任何责任的吗？一个好好的活人，折腾死你就死了，难道我们又回到原始社会了？难道我们能和当年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一样吗？

（六）

当真是彻底“改正”了吗？当真“平反”了吗？不是有朱镕基做了不歧视、不欺凌、不压迫的样板吗？

在历届运动中，在毛泽东“保护积极分子”的政策下，一批批积极分子非但在政治、经济、生活上获得了血腥的好处，而且他们仍然一直继续以“极左”的面目活动着。他们积运动之经验，深深地懂得“积左”在任何情况下，只会获得好处。记得有人说过：“革命队伍从来都是由理想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组成。而最后，所有权力和利益的获得者则是机会主义者。”几十年来他们大都做了“官”，弄了“钱”，成了各单位上上下下的主要成员。他们认为给右派落实政策无异于是对当年反右中用伤天害理换来的“积极分子”荣誉的否定。更是对他们如今获得的利益、声誉、官阶等的嘲讽。所以，给右派落实政策他们打心眼儿里不满意。

1978年，给右派落实“改正”政策时，本来处理右派有一种“保留公职，送劳动教养”的二类处理办法。按理说，既然保留公职，就该回原单位，但是有的单位硬是扛住不接收。因为这个活人的回来，就等于在他们身边安放了一面可以显现出他们当年作为“积极分子”丑态的镜子。“拒绝接收”分明是违反政策，然而“保护积极分子”的余荫一直阴魂不散，袒护着他们，使得这批人对任何事件都无所畏惧。所谓的“组织”也奈何不得他们。

当时还听说，为了落实政策的需要，中央批给10万进京名额指标。有些有权者却假公济私，把他们的亲友借机搞到北京，有些该回来的右派只得留在外地。

一位右派落实政策后参加了党，当工作需要提拔他担任某个职务时，材料报到组织部门，竟然说：“他有右派的历史问题，不能批。” [注3]

有的单位在评定职称时，“左派”说：“他们（右派）二十多年没干工作，那怎么可以评职称呢？”于是，“左派”又升级，又加顶戴。连 A、B、C、D 二十六个字母也不认识者，居然恬不知耻地也戴一顶“高级××师”的职称桂冠。似乎这些“左派积极分子”只是脸皮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无限地“厚”，没有“知觉”，只要有利可图，没有他们不沾的，任何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是脸红、良心，什么是廉耻！

直到 2001 年，已经落实右派政策二十三个年头，仍然有一个叫做陈瑞华的人，在《中外法学》（此刊听说是北大法学院编的）杂志上撰文说：“在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劳动教养制度显示出了空前的生命力，在全国被划为右派的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中，劳动教养是处理这些‘右派分子’的主要方式和首要手段。”大加赞扬这个非法之法的“劳动教养”。为好人被错划为右派，被人利用“劳动教养”这个“恶法”冤狱二十一年而拍手叫好。

香港《凤凰周刊》2004 年四季度有一期载文说：黑龙江某地一个劳教农场，直到 2004 年，在农场被教养的右派，因为原单位变更，原住城市没有房（划右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没有了房）；还有在大学时，被哈工大送劳教，落实政策时，哈工大已撤销，无人受理安排，只能继续留在劳教农场劳动，直到退休，也是从劳教农场退的。未来的坟场也是农场。他们把一生葬送在“劳教农场”。对于这，难道不是世界少有的人间惨剧？

由此，忽然想到，右派分子林希翎后来被正式逮捕。在监狱里，有一位审判人员审判她的时候，对她说了一段恶狠狠的话：“你看着吧，共产党还对付不了你这黄毛丫头！我要让你年轻轻轻地进我这监狱，而把你关到白发苍苍，我要关你一辈子，我要让你断子绝孙！”^[注 4]

是的，不少右派分子确实被教养得白发苍苍了。林希翎倒没有断子绝孙，而相当数量被教养了二十一年的右派分子，却有不少人真格的是断子绝孙了！这难道不是一场世界历史少有的人间悲剧？

这就是劳动教养的所谓“生命力”？

这就是所谓的“行政处分”？

这就是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方式？

这就是“不是刑法，胜过刑法”的中国特色的《决定》？

[注 1]毛选第五卷 P.163

[注 2]和凤鸣：《经历——我的 1957 年》

[注 3]《书屋》杂志

[注 4]卢弘：《右派活化石——林希翎》

附：网评一则】

朋友：

我一口气看完了《中国的“劳动教养”是怎样教养右派的》。它一方面使我哽咽，另一方面大大长了我的见识。

我以前只熟悉留在原单位接受群众专政的右派分们的是如何低人一等，不知道那些被长期劳教的过着 20 年暗无天日非人生活的右派分子们的遭罪。

看完《中国的“劳动教养”是怎样教养右派的》以后，我才觉得自己有资格估量中国这60年来的人权状况，法制状况。

劳动教养制度是毛泽东一手炮制出来的，是用以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残酷惩罚、折磨（和将仇恨发泄于）右派分子的。我原来想用“苛政猛于虎”来形容共产党的暴政，细思量后，发现“苛政猛于虎”不足以形容其万一！

我学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名言“打铁还需自身硬”说一句——“爱民还需心肠软”！

爱民的首长呀，您看了右派分子们在劳教场的遭罪以后，大约不会仍然那么铁石心肠了吧。

“直到2001年，仍然有一个叫做陈瑞华的人，在《中外法学》杂志上撰文说：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劳动教养制度显示出了空前的生命力，在全国被划为右派的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中，劳动教养是处理这些‘右派分子’的主要方式和首要手段。”大加赞扬这个非法之法的“劳动教养”。

朋友们警惕哦，陈瑞华那样的铁心人，现在还不少，没准还在学堂里作报告哩。

陈祚璜古体诗词选



作者简介：陈祚璜，名梦岳，湖南祁阳人。1915年10月生。就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抗战后入川，于中央大学毕业后，在重庆等地的市一中、市一师、清华中学多所名校任教，重庆特级教师。在重庆七中校长任上被划为右派。夫人刘淑明，重庆巴蜀中学生物教师，因丈夫“右祸”，被诬“历反”，全家老幼齐遭苦难20余载。“改正”后，1988年离休前，系重庆教育学院物理系教授。1998年辞世。先生虽习理科而酷喜习赋诗词，此志一生未缀，至老尤笃。著有《陈祚璜诗词集》。

（摄于九十年代初）

别情篇

余于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后的廿余年间，家人很难得团聚在一起，经常处于离妻别子的日子之中，自然会在吟咏上有所反映，皆为极含深情之作。

祝英台近·别情^①

意中焦，眉头皱，短吁长嗟后。挈女携男，别有伤心处。任是泪透鲛绡，阳关千叠，唤不转，行云且住。

人何去？远望水复山重，心共孤鸿度。顾影含悲，飘荡怜飞絮。历尽冷暖人情，功名世路。剩如此，悔作冯妇。

注：①我于1958年初被划为“右派”后，次年暑假被送到南桐山区农村劳动，妻在我下乡后携儿女到鹅岭公园一排解胸间积闷，殊料反而更增离愁。余获知后，特就其情拟上词寄之。

渔家傲·鱼田送别^①

送别鱼田卿意好，十里清溪，踏破东林晓，只怪匆忙车发早，相思又是关山杳。
二十年来欢聚少，儿女东西，尔我别中老。但愿情开新月皎，斗光冲破星河小。

注：①1977年淑明由原任教学校市41中，安排到南桐矿区鱼田堡附近的分校，边劳动边上少量的课。我被安置在原市三中劳动改造，每次欲前往妻处探视欲请准四、五日之假，还须经市教育局批准。两地相距三百余公里，所以均是来去匆匆。当返重庆时须晨五时起床，妻陪我沿清溪河走十余里山路，急于赶到东林车站，才能乘上早上七点半钟开的回渝车次，临车发时，总是别情依依，曾赋上词以志感。

忆秦娥·雷儿离家八年后重聚^①

深更月，邻家奔告来乡客；情飞越，三千里外，山水重叠。
儿归呼父声声切，相逢几至不相识。八年别，儿长如父，父鬓如雪。

注：①余已被划为“右派”而陷入困境，次子晓雷与次女晓晴只得于1962年送回湖南老家投靠兄嫂，时晓雷九岁，晓晴七岁。八年后，晓雷于春节前从湖南来重庆探望父母，抵达我所在的市三中时，已晚上十一点了，问到问到住处，父子久别重逢，儿长大成人，父更衰老，乍见几不能认出，迅成上词以记之。

鹧鸪天·晓白三十岁生日^①

走过崎岖三十年，含情回顾景依然。南桐山共长湖水②，都是征程第一篇。
见世面，结人缘，从中仔细辨媸妍；每逢五月龙王水③，紧靠航标慢放船。

注：①1977年6月30日，系大儿晓白慢三十岁生日，余正在病中，特寄此词至长寿湖渔场以勉之。②晓白13岁时，适我被划为“右派”遣送南桐山区农村，晓白随到农村，后其母被遣置到长寿湖渔场，晓白14岁即在渔场以童工参加劳动，“南桐山共长湖水”即指此。③记晓白诞生时，长江正涨大水，洪流滚滚，俗称“龙王水”的季节。

踏莎行·别南桐山区农家老媪^①

客里依稀，荒年共度，炎凉早已无亲旧；天涯何处计归程？南桐踏遍山无数。
啼饥小儿，馈饭农妇，这番情景堪回顾；难忘天下有心人，慨然泪湿青山袖。

注：①59年我被遣送到南桐新台农村劳动，儿女亦随同至农村，时值荒年，年仅六岁的幼子晓光，因饥饿患严重水肿病，所寄居的刘家老婆婆见而悯之，常以饭馈晓光，此恩难忘，常忆及此事，特记以上词。

贺祝篇

七律·祝章亿同志^①七十寿辰

箱中检点军衣旧，镜里频添白发多。岂意诤言获重咎，不辞领唱仍高歌。
稚孙绕膝今常乐，老友谈心志未讹。早许终身跟党走，世途何患有风波。

注：①章亿同志十几岁时就投身新四军参加革命，长期搞文工团宣传工作，解放后曾任市四十一中副校长。五七年曾与其丈夫老徐同志同被划为“右派”，徐在修铁路劳动中身故。

沁园春·为内子淑明七十寿辰而作

高镇初逢，遽结同心，似有前缘。记红梅簪鬓，王园春早①；鑑湖分影，情意缠绵②。同在天涯，自甘贫贱，我是书呆卿亦然。相思苦，动春风词笔，诗满吟笺。

灯前，往事萦牵，忽相守白头四八年。突诬成牛鬼③，举家流放；幼儿弱女，人见犹怜。我被隔离，卿尽全力，月缺中天今又圆。幸皆健，更尔尊我长，我敬卿贤。

注：①1943年我们初识于丰都高家镇啄成中学，曾约于丰都城郊王氏墓园，时园中红梅盛开，余曾折一小枝簪在伊的发鬓上。②1945年我在涪陵县中教书，校前江中有石梁围成小湖，水清可鉴名曰“鑑湖”，我们常坐湖旁柳荫中观江景。③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

永遇乐·离休书感（1988年10月）

一度簪花，廿年逐放①，往事如雾。已老冯唐，半条剩命，拼搏到垂暮②。自慨残烛，犹炽余穗，差可照人前路。秋意渐，西园叶落，暮经几番风雨。

一声离退，遽辞教席，归抱孙儿孙女。教授微薪，甘贫素养，节约能过去。挑灯偶读，老妻呵责，枉费膏油几许。耽心是，闲生旧病，最难调处。

注：①指56年被评为全市优秀中学校长，戴大红花，57年即被打成“右派”，时间仅隔一年，政治上变化竟如此之大，是意想不到的。②79年，“右派”得到“改正”时，我已63岁了，既老且病，又为创办高师班筹划兼授课，奋力干了十年，到88年离休是74岁了。

哀悼篇

琐窗寒·悼胡耀邦同志

一讣惊传，九洲震恸，国折梁柱。长街十里，不尽别公离绪。怎能忘，恩泽士林，“二次解放”铭肺腑。敢顶风逆浪，还真求实，力克重阻。

重度，长征路，曾土角田头，访贫问苦。征鞍未歇，心系千家万户。坦胸襟，廉正无私，音容宛在人何处？荐馨香，奠遍神州，功业垂千古。

七律二首·痛悼谭芝萍老友①

（一）桃花开罢菜花开②，又可弹冠上讲台。世历时艰增旷达，诗从律细显奇才。
辨经岂苟杂真伪，传道何须问去来。师道文章千古事，斯人一去八方哀。

（二）桃花谢罢菜花香，又是弹冠上讲堂。纵许余生图寸效，能忘廿载已深伤？
退居就适殊非易，箋杜谈诗亦大忙③，人去永留佳句在，临风一读一回肠！

注：①谭芝萍同志多年在大中学校讲授古典文学，尤工于诗，为市内著名女诗人之一。曾于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遭受廿余载的不公正待遇，此挽诗作于1993年11月28日。②唐刘禹锡《再游仙都观》诗中有“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等句。“桃花”指曾权倾一时的保守派，业已垮台了；“菜花”指又被启用的革新派。此处借喻左氛清除后，冤假错案获得平反，有才能的人又先后恢复了工作。③谭年来为校订杜工部诗集的注解，发表了大量深有卓见的文章。

何满子·痛悼老友卢光特①

来奠多年挚友，不忘患难深交。底事诤言获重咎，堪嘲左氛尘嚣。坚信能还真象，长湖廿载渔樵。

不负一支史笔，遍传烈士情操。竭力求枉者直②，奔波卓著辛劳。如此贤良难得，临风一恸魂销。

注：①光特同志早年投身革命，为川东地下党重要领导人之一，热心关怀同志，交游极广。不幸于五七年被划为“右派”，被遣送到长寿湖渔场，经过了廿余年繁重劳动的折磨，平反后，主持烈士纪念馆及撰写党史工作，积劳成疾，逝于1994年2月18日。②在主持烈士纪念馆工作期间，为从历史上落实尚未被列入烈士的同志的遗留问题，几乎跑遍全国以获取可靠的证明材料，使这类问题都一一获得如实的解决，这说明他对革命牺牲了的同志也是一样负责的。

他们会有绝招

振 秋

推翻蒋家王朝	帮助我党整风	秘密排队定罪	中国名声地扫
中共确有功劳	陷阱再加绳套	全国比例定好	政治运动不断
高唱民主自由		百分之五为基	高层互相撕咬
全球为之叫好	首先表示真诚	当然只多不少	社会道德沦丧
	信誓旦旦呼号		经济濒临崩倒
拥护老毛登殿	愿意改进作风	可怜各界精英	
谁都呼喊党好	批评越多越好	一齐落入圈套	此一严重后果
都望振兴中华	希望大家发言	老毛确像观音	世界为之声讨
把我国家建好	尤其各界头脑	送你金箍大帽	老毛众叛亲离
	特别知识分子		只得气死天天
好好好好好好	尖锐意见趁早	右派分子箍头	
迎来五七春早		地富反坏同僚	三中全会召开
看似柳暗花明	若不提出意见	反党反社原罪	老邓挨整够了
殊知夏寒料峭	就是对党有隙	降职降薪劳教	耀邦平反冤案
	若不参加整风	可惜无数精英	老邓聪明地道
老毛深宫发烧	更是大逆不道	落入炼狱镣铐	
老邓跟着昏脑		二十二年岁月	虚幌一枪定夺
觉得神州震动	可怜许多好人	死亡数目难考	用个改正最妙
太和大殿颤摇	缺乏政治头脑		改正右派出炉
	大都信以为真	有人表现认罪	中外大牙笑掉
以为知识分子	真心跟着毛跑	来个右派摘帽	既不补发工资
一定会把反造		赐名摘帽右派	更无精神补找
必须马上动手	岂知这是诡计	令人大牙哭掉	随便派个工作
坑儒仍为上招	引蛇出洞新招		就算对你示好
	你乃牛鬼蛇神	此后人人自危	
于是精心设计	出来就好打扫	全把嘴巴闭了	如果你要申诉
方法重弹老调		中华大伤元气	

国安对你关照	监牢早已备好	不平自有公论	错了就是错了
喝茶劝你不听		平冤岂可率草	羞答拖延不好
全程监控入套	谭松为右呼喊	即使硬控万年	
	重庆二监入牢	后人仍会呼号	相信总有一天
如果还不听话	以为他会害怕		右派问题会了
当然就是警告	熟知他更高调	还是奉劝中共	中共不乏能人
他人若来申冤		历史应还本貌	他们会有绝招

我们这代人

佚 名

我们这代人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童年饱受日本侵略者之害，少年又遭国共内战磨难，成年后吃尽了毛泽东暴政的苦头。下半辈子总算熬到了改革开放，但还没有尝到甜头，就快到了退休之年，这一退下来，连原来那点儿社会主义生活保障也没了。有人说我们这代人是中国大陆上最倒霉的一代，我很同意。不过我想补充一点：我们这代人也是有幸的，有幸亲眼目睹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改朝换代，有资格以见证人的身份来谈谈对两个朝代的感受。

我们这代人生在旧社会，长在新社会。共产党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我不知道旧社会是怎样把我变成鬼的，也说不清新社会把我变成了怎么样的人。反正我觉得自从 1949 年以后我就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说我不像人是因为我没有独立的人格，共产党要我长我就长，要我短我就短，像个面团团，而我自己还要口口声声说，“我是党的驯服工具，”发誓要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面团不是人，工具和螺丝钉更不是人，对吗？！说我不像鬼是因为我还有点人性，没有被党性，奴性，阶级性等完全鬼迷心窍，干出见不得人的事来，如打小报告（告密）和出卖亲友等等。

我们这代人原来是中华民国国民，青天白旗下人人平等，至少理论上如此。我从小学开始就受公民教育，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1949 年以后我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五星红旗下人分四个阶级，共产党领导一切。我们从此在一党专政下失去了自由。党要我们“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走一辈子革命的路，一辈子改造思想……”改造思想或思想改造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不仅要“触及灵魂”，而且还要“脱胎换骨”，“向党交心”，拒不交心的就交命。后来我才知道思想改造就是洗脑，洗掉你的良知和独立思考，盲目接受党的统治和灌输。大家都在洗脑过程中学会了说谎，说得好的入党当干部，改造别人，步步高升。说不清或说不好的就永远被改造。不说谎的就是抗拒改造，轻则劳动改造，重者把命送掉。中国人从此变成一个扯谎的民族。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不少政治运动，有人统计过从 1949 到 1976 年的二十七年中共有大大小小五十六次运动。我记不清，反正老毛死前大运动隔三逢五，小运动连续不断，一年两三次，运动套运动。所谓运动就是人斗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斗得老毛其乐无穷，斗得我们胆战心惊。每次运动都要斗一大批人，死一批人。每个单位都有斗人的指标，每个人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概莫能外。运动一来，检举揭发，人人交代，“脱裤子”，“割尾巴”，

“让党放心”，争取过关。过得了的等下次运动，过不了的隔离审查，把你关起来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你就被迫日日夜夜写检查，真是写不尽的交代流不完的泪。有的人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和折磨就含冤自杀，还落得个“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罪名。运动后期定性，轻则戴上各种帽子，重则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知有多少人死于非命。

我们这代人大半辈子乖乖地上当受骗当二百五，夹着尾巴做人。其实我们并不傻，上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腐败，我们上街游行喊“打倒蒋介石！”共产党来了镇反，肃反，反右派，谁敢讲真话就杀，关，管，劳改，杀鸡吓猴，从此我们就装疯卖傻讲违心话，做违心事，喊“毛主席万岁！”五十年代大跃进，我们砸了家里的铁锅大炼钢铁；大跃进失败，饿死农民三千万，我们饿得有气无力还得拼命唱“社会主义好！”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我们除“四旧”，挖祖坟，打内战，早请示，晚回报，含着眼泪送子女上山下乡，还要感谢党和毛主席为他们创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七十年代老毛死了，“五人帮”垮台，后来审判四人帮时江青说她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我们照样对她主子没心没肺的干尸继续崇拜。八十年代改革开放，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高干子女和贪官富了，老百姓穷了，学生起来反官倒反腐败，他说是“反革命叛乱，”派坦克进城杀学生。学生流血街头，我们冒死抢救，想不到回到单位不仅要检查交代，而且还要“与党保持一致，”才能过关。九十年代一切向钱看，人心越来越贪，道德越来越坏，环境越来越糟，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明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偏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十一世纪开始我们早已知天命，过了耳顺之年，就是没有从心所欲，只好对什么事情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求个安度晚年。

我们这代人现在都已七老八十了，迟早要上天堂或下地狱。有人要去见马克思，那就让他们去找吧。我晚年皈依基督教后才领悟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旅居而已，天上才是我们永恒的家。上帝把我们暂时留在这里，要我们传福音改变世界。但我没有改变世界，而是世界改变了我，我是有罪的。上帝啊，在我来见你之前，我要向你忏悔，我是个罪人，这辈子做了不少错事，其中最大的错误是说谎话。林彪说，“不扯谎，成不了大事。”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干什么大事，但我得扯谎。文化大革命中我真是想老毛早点死，但我得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不喊，我能活到今天吗？上帝啊，请你宽恕我的罪吧，容许我在来见你之前把我这辈子想说的心里话讲出来。上帝啊，我向你祈祷，愿我们中国人不扯谎也能平平安安活下去，愿我们的后代再也不会经历我们这代人的痛苦，阿门！

张淑芬著《我所认识的右派》读后感

陈在辰

我曾经在赵文滔老师处读到过张淑芬回忆反右的小说体著述《我们没有青春》。最近赵老师又转给我张淑芬即将付印的文稿《我所认识的右派》，新作使我又一次受到了震动。这又是一部对五七年毛泽东残酷迫害知识精英的血泪控诉。当我面对张老师 17 岁的照片时，我的心

在颤抖，泪水又一次充盈了双眼。多么可爱的妙龄少女，多么令人艳羡的青春年华，还是一个能在父母跟前撒娇的孩子，还是一朵尚未来得及绽放的生命之花。

就在这一年，她成为和学生年龄相仿的小老师。她爱唱歌，善写作，正憧憬着青春少女的艺术家之梦……只是因为在给班主任潘森林的信中表示了对未曾谋面的老乡，四川青年诗人流沙河被整的同情，却被潘把信寄到学校，构陷成“罪行”；再加因为讨厌一团团翻滚的苍蝇，骂了一句：“破 18 中，破大红门”，就又被污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刚刚走出天真少女的行列，只向成年迈出了第一步，19 岁时就被打成右派，从此跌入人间地狱的万丈深渊，生活无着、婚姻不幸、一双儿女受欺凌，被反右毁了一生。

张老师在文章中说，当她怀着 8 个月的身孕仍被驱赶着冒着瓢泼大雨参加重体力劳动，我不能想象那是在经历着怎样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她面对两个十三、四岁儿童的辱骂，只想用手中的四齿抓钩把他俩推到河沟里去，完全是一个“大女孩”对两个“小孩”的辱骂的激愤和无助的宣泄。我知道她所处的环境比起夹边沟，比起北大荒右派的遭遇还算好的。我也曾看过戴煌著的《九死一生》，了解到 60 年前后右派在北大荒的悲惨遭遇。极度的饥饿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右派们处于绝望之中，仅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就在劳动回来的路上倒下了 7 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的生命。我所认识的杨崇道老师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之一。

文革使右派遭受了又一轮更疯狂的迫害。白天十二个小时以上的体力劳动之后，夜晚八至十点还要开他们的批斗会，随时都会遭受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拳打脚踢。更有甚者，在张老师怀孕五、六个月时，竟被驱赶着陪杀场!……从 57 年获罪至 79 年改正，张老师是经历了怎样的生不如死的煎熬和挣扎才侥幸活到了今天。可一个人一生能有几个 22 年，又是正值青春年华的 22 年呀！

据史料记载，57 年反右打了 55 万右派，实际扩大至 3178470 人。紧接着经过人民公社大跃进折腾后的 59 至 62 年，饿死百姓 4000 万，文革中有一亿人被斗 2000 万人死于非命。反右和文革受到残害的主要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之中的知识分子精英。古人说：“知错即改，善莫大焉”。周恩来也说过：“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要重复错误。”然而毛泽东犯下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严重错误，涉及上亿人的生命，却从来没承认过错误。相信随着人民的觉悟的不断提高，历史必将澄清真相。

我是所谓的“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是文革中激进的红卫兵，是下乡时被选举入党的知青，算是对历史对政治比较关心的人。由于长期受骗于“遗忘工程”，对反右、文革的历史事件知之甚少。有幸结识了右派群体，看了李锐、李慎之、戴煌、倪艮山、赵文滔等和右二代章诒和、章立凡、李南央等的回忆录，看了武宜三、王友琴等的相关文章，今天又读到了张老师的文稿。每一部每一篇揭示的惨绝人寰的史实，每一个人的血泪控诉，往往使我感同身受，不忍卒读。在悲愤和压抑之中，使我流下同情和难过的泪水，在了解了历史真相后改变了对毛泽东的认识，有了迟来的觉悟，也在反思和拷问着自己的灵魂的过程中，有了道德良心的提升。

正如张老师所说，反右和文革留给被害人的创伤，每回忆一次都是揭开记忆的伤疤，都

会引起血淋淋的创痛。但她却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回忆和记录下了她和她所认识的右派们苦难的往事，为后来人了解和认识反右真相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人们应该感谢她。

应该感谢李锐、李慎之、顾准、戴煌等这些右派们，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和法制对我们所进行的公民教育；

应该感谢八十八岁的倪良山、八十五岁的赵文滔等右派老人，虽至高龄仍忧国忧民笔耕不辍，为实现民主和宪政而鼓与呼；

应该感谢香港武宜三主持五七学社、五七出版社，帮助右派出书、为右派立传所做的大量的义工工作；

应该感谢沈志庸，（北大学生右派！）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收集和转发最新资料，为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腐败和暴政而不知疲倦的坚守

应该感谢右派联络员杨崇道（军委军人右派！），付出体力精力和财力到全国各地帮助右派出书，为抢救右派史料所作出的无私奉献……

右派是知识分子精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右派曾指出并仍指引着中国民主和宪政的发展道路。我尊敬和热爱他们。

誰感謝誰？

北明

二戰一代美國軍人是捍衛人類自由的英雄，是“天下一家”中國古訓的踐行者。現在大樹飄零，一個傳奇的時代已到尾聲。中國什麼時候才能說一聲謝謝？他們曾經在世界最危險的航線上，用自己的青春贖買他人的自由。他們不曾要求那裡的受益者

緬懷他們付出。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他們僅僅希望漢語世界能夠正視這段歷史。

援華抗戰飛越駝峰的導航員文達爾·菲利普斯(Wendall A. Phillips)去世了。消息傳來，我心裡重錘敲響。我決定在他的追思會上表達我和中國友人們對他的敬意和感謝。

圖 1：美國援華抗戰第十四航空隊駝峰空運導航員文達爾·菲利普斯(Wendall A. Phillips)2012年9月26日在賓州自己的公寓病逝，終年89歲。他的逝世代表一個英雄時代的終結。這是這位老兵援華抗戰時期的照片。



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不僅因為文達爾是我的忘年交。二戰之後世界各地都有美軍犧牲

將士的墓地墓碑，每年感謝的浪潮從人們的記憶中湧上各種公共場所，而援華抗戰的美軍至今沒有獲得過正式的感謝。了解這段歷史的華人如我，近年來已經經歷過幾次美國援華老兵辭世，這次不可避免要參加文達爾的追思會，不能無動於衷。

但是我忐忑不安。因為有留學的中國後生善意地勸說：追思會是家人私事，發言內容應該盡量私人化，國家事務，歷史煙雲，應該退場。此外由於必須用英語表述感懷和敬意，我被自己這個決定也嚇得不淺，一想到要當眾結巴，簡直要放棄。

可是培瑞（Perry Link）不忍我的哀求，舍了時間把我的講話翻譯了，傳來了。當我讀過那行行理解準確、用詞精當、既合乎西方表達又傳達漢語內涵的英文表述，頓時有了信心。

接著我請安排葬禮的文達爾・菲利普斯的長子馬克・菲利普斯看一看稿子。我問他：我是否可以在追思會上念這稿子？我說的是“念”（read），不是“說”（talk），我希望他藉此明白，我的發言不會由於語言上的障礙使聽眾不安。我既非菲利普斯的家人，亦非他的戰友和同事，我是他的中國友人，雖是忘年之交，卻有不同的母語。馬克並不了解父親的歷史，只知道父母結婚前，父親二戰時在兩戰場做飛行導航員。不料他即刻就回覆了，他說：讓人們聽到這個發言的內容非常重要！他說：“有你加入發言者行列，是我們的榮耀”。

盡管馬克積極的態度使我頗受鼓舞，這個發言引起的熱烈反響仍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圖 2，文達爾・菲利普斯的追思會 1012 年 10 月 2 日上午在賓州特雷克斯勒殯儀館舉行。這是殯儀館追思堂文

達爾・菲利普斯棺木左側的陳列物。右起第一張圖片是菲利普斯與他的中國友人的合影（右起上排：李瑾、郭恩陽、王康、北明、鄭義；右起下排：鄭美妮、文達爾・菲利普斯、弗蘭克・李）；中間台上是文達爾戎裝照片、他與家人的照片、別滿徽章的當年的軍帽、中緬印戰區老兵協會徽標等。

石霄 2013 年 10 月 2 號攝於賓州特雷克斯勒殯儀館

我一直位於追思會場前部一個大多數人看不見的角落。發言完畢、追思會結束後，竟有很多人走到這個角落找我握手擁抱，表示認同和支持，其中包括菲利普斯的朋友，美國國會議員查理斯・丹特。另一個瘦削的白髮飛揚的老兵則對著我的耳朵悄悄說：你的發言是這個追思會上最棒的。一位青年女性眼睛閃著光告訴我，她是一個教師，她認為我的發言太重要了。她說，她的學生了解這段歷史，以後她還將繼續努力使她的學生了解並記住這段歷史。在我走出殯儀館之前的十多分鐘時間裡，幾乎每一個與我見面的人都對我點頭稱許並表示感謝。主持告別儀式的牧師威廉姆斯・裡根先生遞給我一張名片，在名片背後，他加寫下自己的電子信箱地址，請求我把我的發言寄給他一份。

最重要的是馬克的反應，在次日的來信中，他再次稱贊這個發言意義深刻，還說，他回到學校後，把這個發言的文稿專門打印出來與同事們分享了。

最令我感動的，是在座老兵中的一位。追思會結束之後是 60 英里之外的菲利普斯賓夕法尼亞州國家公墓的葬禮。儀式結束之後，這位老兵撥開人群，來到葬儀場地的前面（葬儀時，我被菲利普斯的妻子弗蘭斯西邀請，坐在她的身邊），他找見我，握住我的手，說要告訴我“一些事”（Something）。我握住他的手，望著他的眼睛，仔細傾聽。他卻在開口的瞬間哽咽了。克制了一會兒，他平靜下來，終於說了一句話，“一些事”濃縮成的一句話，他說：“你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菲利普斯的願望（What you are doing is Wendall's will）。說完，老人用他老淚縱橫的眼睛鎖住我，嘴唇再次蠕動，而不能出聲。然後，他鬆開我的手，掉頭走了。

我“正在做的事”，流亡美國以來我一直努力做的事，不過就是直陳歷史，消解謠言。

靜靜的頓河畔，格利高里那隻折翅的天鵝尚且不斷引頸向上，依然希望飛過深邃遼闊的天空，更何況是搏擊過雷電冰雪的美國飛虎！

人類有航空史以來的首次空運壯舉，是二戰時期美國空軍飛越喜馬拉雅群山的“駝峰空運”。美軍飛機失事率高達百分之八十，史稱“死亡飛行”。美軍援華抗日的軍用物資運輸量，從最初每個月 196 噸提高到最後每月 72000 噸。這不斷加碼的運輸量，是在持續不斷的死亡飛行中實現的。八百里航線上峰脈綿延，氣候瞬息萬變，但有一線陽光燦爛，深山峽谷中失事的飛機殘骸就閃閃發光，被後死者當作領航標記。為了中國的領土完整和國家主權，近 3000 美國空軍飛行員和他們駕駛的 1500 架運輸機永遠長眠於駝峰之下了。——這些事實如今已經不再是黑箱中的秘密。老文達爾是 C-46 大型運輸機的導航員，駝峰空運任務中的倖存者，曾經 116 次飛越那人類最高的山巔。他此前在歐洲戰場被擊落，做過納粹戰俘，此後從中國天

空失事，做了日軍的戰俘，深受折磨。

二戰期間美國在東西兩半球同時開闢的三個戰場之一，“中緬印戰場”，在當代美國軍事史家筆下是“被遺忘的戰場”。其原因不僅在於這個戰場面積小，且無艾森豪威爾或麥克阿瑟知名將領，深在的背景是：美國左派操控下的杜魯門政府在四十年代末對民國政府的拋棄和東亞政策的失誤。“誰丟失了中國？”上個世紀中葉美國這巨大的錯誤和傷心的話題，把這個國家的對華援助的義舉幾乎一筆勾銷了。無人願意翻檢一部鮮血白流的老賬。當年在中緬印戰場服役的老兵們如今寂寞可想而知。可是無論後來的美國東亞政策如何失敗，畢竟受惠的是中國，趕走了日本侵略，奪回了領土主權，捍衛了家國尊嚴的是中國。

我理解這位在追思會後等候三個小時，把“一些事”變成了一句話美國老兵的心思：他們曾經在世界最危險的航線上，用自己的青春贖買他人的自由。他們不曾要求那裡的受益者緬懷他們付出。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他們僅僅希望漢語世界能夠正視這段歷史，他們盼望他們救助過的國土不再剷除他們留在那裡的屍骨和血跡！



圖 3，美國國會議員查理斯·丹特（Charles W. Dent）、文達爾的老朋友，在追思會結束後，感謝北明（Bei Ming）對援華抗戰駝峰空運導航員文達爾·菲利普斯的緬懷與追思。這是他們追思會後的合影。
石霄 2013 年 10 月 2 號攝於賓州垂克斯勒殯儀館

2005 年，美國“中緬印戰區老兵協會”在華盛頓召開了最後一次年會，嗣後解散。老兵們年事已高，整整七十年過去了，20 歲的小伙現在 90 歲了，他們離世的速度不斷加快，所剩

無多了。

二戰盟軍一代，是制止戰爭，解放奴役的一代，是為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奮鬥的一代，是人類英雄的一代。美國軍人從和平的家園出發，向歐洲、太平洋、中緬印等各個戰場出兵，幫助其他民族和國家抗擊侵略。有人說，那是因為他們在珍珠港挨了日本的致命空襲。但事實是：美軍珍珠港海軍基地遭日本偷襲，是因為美國在數次與日談判中，要求日本從中國領土全面撤軍未果，斷然切斷了通往日本的石油運輸，並以政府行為干預本國自由經濟，禁止工業等軍用原料輸出日本，同時聯盟菲律賓、英國等國家一起對日進行經濟制裁！所以日本人一邊以談判拖延時間，掩人耳目，同時偷襲珍珠港美國海軍基地，以為報復。

言及二戰時期中美兩國協同作戰，很多了解抗戰史的朋友會指出一個事實：中國抗日戰場拖住了 100 萬日本精兵強將，為美軍太平洋戰場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確實如此。否則，美軍在太平洋那些群島上將會遭遇更殘酷的戰役和更慘重的犧牲。這個事實，美國軍人也認同。兩年多前，我的另一位援華抗戰忘年交，美國老兵尤金•蘭斯（Eugene Lance）在賓州“臨終關懷”醫院逝世（他一直把我們 2005 年在老兵協會最後一次年會上的合影儲存在相機裡，隨身攜帶，隨時翻看），咽氣前，前來探望的中國友人周澤浩對他表達謝意，他則用最後的力氣回答說：“彼此彼此，美中兩國互相幫助。”談及同樣的話題，老菲利普斯也表達過同樣的意思。事實上，拖住日軍，減輕太平洋戰場壓力，是美國政府當年出兵幫助國民政府抗戰的原因之一。

可是我想，歷史不是原子物質，不會由於無限分裂而改變性質。在具體分析現象的時候，不能現象產生的前提。這個前提就是：美國原本可以堅持“門羅主義”的國際外交孤立原則，避免捲入戰爭。北美這片新大陸遠在地球的另一端，歐洲和遠東的戰爭未能危及美國領土，如果只考慮美國本土安全，保持中立是最佳外交選擇。是因為要出兵幫助他國反對侵略，他們才需要被侵略國家的合作與幫助。也就是說：需要你幫助我來幫助你！中國在自己抗日戰場英勇奮戰，拖住了百萬日軍，確實幫了太平洋上抗擊日寇的美軍的大忙，可是美軍在太平洋忙活什麼呢？忙着打日本，忙著消滅太平洋島嶼的日軍，並且最終迫使日軍投降，抗戰勝利！按照歷史的邏輯，中國在本土抗戰，為美軍拖住百萬日軍這一行為，準確的解讀是：中國軍人為美軍幫助自己保家衛國提供幫助！

二戰一代美國軍人是捍衛人類自由的英雄，是“天下一家”中國古訓的踐行者。現在大樹飄零，一個傳奇的時代已到尾聲。中國什麼時候才能說一聲謝謝？

想起了多年前看到的一則報道：50 名老兵回到中國，故地重遊。在從重慶飛往昆明的飛機上，他們不斷用老花眼向地面搜索當年的空軍基地和記憶中的地面標志。飛機落地前，

他們意外地看見了捧著鮮花的年輕姑娘和跨著相機的記者人群。他們相互傳告，激動起來。飛機落地，艙門開啟，空姐卻彬彬有禮地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對不起，請讓日本朋友先下。”

“哦，好的，”他們愣了一愣，順從地為日本乘客讓開了通道。

等到日本乘客下了飛機，他們尾隨而下，向歡迎的人群舉起了手臂。

不料卻再度被機場警衛攔住了：“請問，……是日本代表團嗎？”

機場警衛一臉狐疑，這些西方面孔的老頭兒怎麼回事？

西方老頭兒有些著急，歡迎他們的人群已經久等了！

可是警衛弄明白他們不是日本人之後，更加堅決地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對不起，請走那邊。”

老軍人們終於明白這不是誤會，望著鮮花和攝影組合的歡迎人群，他們囁嚅着問：

“那邊……那邊……？”然後，他們聽清了翻譯的回答：那邊是在歡迎一個到訪的日本代表團。

接下來他們幾乎喪失了旅行的意志：在賓館裡，服務員不打掃房間，一日三餐飯菜是涼的。這都罷了，還來了一個什麼“長”，代表全體賓館人員前來抗議：不許這 50 名美國人侮辱他們的祖國！

老人們不知道翻譯有誤，還是他們自己理解力有限。

結果對方指著他們佩戴著的抗日的銘章和血幅說：“你們竟戴著‘青天白日’招搖過市，我們對此提出強烈抗議！”

銘章是當年中緬印戰區的標志，與中華民國國旗和星條旗一樣，以紅、藍、白三色構成，圖案中含有“青天白日”的中華民國國徽；血幅是寫着中文字的一塊白布，證明他們是“來華助戰洋人”，在被擊落在地時，可以使他們免遭中國百姓的誤傷。

眼前的情況超出老人們的理解力。但是他們的進一步努力遭到了更沉重的打擊：一位老兵據理力爭：“美國和中國曾經並肩作戰……”，他的話被打斷了：

“是在朝鮮和越南吧？你們被我們打屁了！”

再善意再遲鈍也不能不感受到嗜血的仇恨和敵意，再智慧也難以理解敵意和仇恨來自何方！

中文翻譯是位惹人喜愛的漂亮女孩，一位老人忍不住問她：

“孩子，這是為什麼呀！？”

.....

老兵們這段真實經歷發生在 1982 年，這則報道來自《駝峰航線》書稿被刪節的部分。

類似被刪節的故事不止一則，發生的時間延續到本世紀初。

無論發生什麼，我希望這樣的故事不曾發生；無論還會發生什麼，我祈願這樣的故事不再發生。

美國中緬印老兵協會在華盛頓召開最後一次年會期間，我問過文達爾：都去中國故地重游了，你為什麼不去？老人諱莫如深，眼睛望著遠方，沒回答。

先行者們故地重游的經驗，不可能不在中緬印老兵協會這老兵之家不脛而走。他們獨自飲下了這杯苦酒，不發出任何抱怨。

可是菲利普斯是多麼關注中國啊！他不光把中國雜技的錄影發給我，說那絕技太令人驚訝了！他也把山西煤老板幾十輛林肯轎車組成的浩浩蕩蕩結婚隊伍的圖片發給我，興奮地說：頂好！中國變化太大了！他還把上海、北京各地水泥叢林的圖片發給我，說：哈！我都不認識中國了！

我哭笑不得，不知道如何使他明白，由於制度的原因，這個國家距離世俗的發達越近，距離人類文明的程度越遠。

上海市著名的跑馬場對面，是基督教青年會大樓。這座建築是在華日軍關押盟軍戰俘的所在地。文達爾·菲利普斯當年就被日軍關押在那裡，受盡折磨。賓州約克大學助理教授周澤浩去年回上海，走進這座建築，與管理人員分享了文達爾被關押的歷史，他把這個信息和這座建築的照片發給文達爾。旋即，我等一千十數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就收到了文達爾的回信。他說：那些照片讓他眼睛不夠用了，他說他沒想到中國竟會保留這座建築。（他當然不知道這座建築不是作為日軍關押戰俘的見證保存的，而是作為基督教歷史建築保存的。）他說他將永遠不會從電腦上消除這些照片。他心中充滿感激之情，對周澤浩說：“我不知如何感謝你！”——劫後餘生，老人為此永遠感謝上帝，他在信中對他在美國的所有中國友人和全體家人說：“無論二戰對我而言是如何結束的，我依然為我在二戰期間服務於自己的國家感到驕傲。劫後餘生，我每一天都感謝上帝。”

中國幾乎沒有人為他援華抗戰遭逢的折磨和付出的代價感謝他。我在追思會上的發言，是一個受惠者對一位施援者表達的謝意。我狀著膽子做了一件力所不及的事情，為此收穫的感謝卻比表達的感謝多得多！

確實力所不及。而且因為緊張，我在追思時忘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文達爾·菲利普斯在他的黃金之路的盡頭帶走了一樣東西，這使得他的葬禮和追思與所有其他美國援華抗戰的老兵不同。他帶走的是一個裝裱精美的中國字幅。字幅中央草書十六

個漢字，是中國對文達爾援華抗戰歷程的總結和表彰：

導航駝峰、九死一生；美國精神，中國傳奇。

這幅字來自中國民間社會和歷史深處，確切地說，來自民國時代的抗戰陪都重慶，是王康的手筆。王康，人稱老康，是那座山城如今的靈魂人物，多年前創辦並主持“中國抗戰陪都文化中心”，耿挺於還原抗戰歷史和繼存民國時代民族精神。悉知我周圍有一群當年援華抗戰的美國忘年交，他 2008 年越洋而來，帶來了同等數量的中國字幅捲軸，他承領天道攜納民意，要在老兵們最後的歲月裡，把敬意，在日本焦土政策中被美國飛虎隊解放的那座山城的敬意，當面獻給文達爾·菲利普斯們。

我曾經見證了這一歷史場面。事實上我和本地的中國友人們分別充當翻譯、司機、攝像、錄影、記者和抗戰史顧問，我們組成了一個小分隊，陪同老康和我們共同的友人岳建一，穿行於賓州幾處老人社區，一一拜謁了這些老兵，完成了這一無人委託的使命。



圖 4：2008 年 8 月抗戰陪都重慶王康遠涉重洋，面贈美國援華抗戰第十四航空隊導航員文達爾·菲利普斯一中國字幅：“導航駝峰、九死一生；美國精神，中國傳奇。戊子仲夏中國重慶陪都文化中心敬贈”。2012 年 9 月菲利普斯故去，這幅字軸破例放進了逝者棺木中，陪他長眠於美國賓州國家公墓。

北明 2008 年 8 月 2 日攝於文達爾·菲利普斯所在的公寓會客廳

字幅來自他曾經戰鬥而受難的土地！文達爾深受感動，挺起駝背卻依然高大的身軀，舉著展開的字幅，嘴裡發出沙啞的呵呵笑聲，那隻八十五歲的駝峰導航之手，結結實實握住了陪都老康知恩圖報的心！

春秋荏苒，轉瞬四年，文達爾辭世而去。直到追思會召開的 12 小時前，我們才想起這幅

中國字應當追隨文達爾左右，隨他的遺體化為塵土，歸於自然，進入永恆。已是夜晚十點多，我撥通了馬克的電話。懵然無知的馬克立刻明白了我的意圖和此事的意義。他放下電話，滿屋子找捲軸，找到捲軸再來電話商議具體辦法：殯儀館內棺木已經封閉，只待次日追思後下葬。但是他次日可以提前抵達殯儀館，為這來自中國的厚意深情，而說服殯儀館破例開棺。

次日一切如願以償。

一個援華美國老兵遺體旁，陳放著一幅表彰他事蹟和精神的中國書法，棺木再度覆蓋星條旗，擺放鮮花，燃起蠟燭……。

遺憾的是，我竟由於一個偶然的原因而遲到了，沒能親自完成這個小小的追加儀式。

當我被介紹走上台去發表我的追思時，主持的牧師提醒我：請順便介紹一下文達爾棺木中的那個珍寶，它是什麼？為什麼要放在逝者身邊？我點着頭走上去，站在文達爾棺木旁，滿腦子被英文告別詞語糾纏住，一個字一個字地緩緩念出，最後不禁熱淚長流。直到我彎腰致意，走下講台，都沒有想起牧師的叮囑，沒有為在座的老兵、朋友、同事、議員，介紹這幅捲軸的來歷和它陪伴文達爾左右的意義。

文達爾暮年在自己的簡歷中寫下的最後一句話是：我一生服務於他人，我感覺自己已經完成了上帝交給我的在世的使命。他確信：“只有上帝知道我的成功和我的失敗。”

上帝也一定看見了這來自中國的厚意！上帝一定知道究竟誰應該感謝誰。

“又有一名士兵回家了”——歌聲從追思大廳觀眾席上輕輕響起。

歌聲落處，雨霧升騰。一列護送文達爾·菲利普斯棺木的車隊，徐徐行進在賓州路上。

墓園進口處，林蔭道旁，旗桿列陣，星條半降，颯颯飄飄蕩蕩。

墓園空間和地表，滿目翠綠，無遠弗屆。

車隊緩緩行進到綠茵深處，猛然一棵老橡樹，撇下眾綠，盡染秋霜。這是這園裡唯一的暖色：緋紅金黃，通透明亮，帶著整個夏季的生長秘密，隨細雨微風，微微地沉墜着，搖曳着。凝視中，我發現這年第一片金色的葉子，帶著晶瑩的淚雨，從那飽滿的樹冠上橫旋而落，親吻了大地。

葬禮開始了。

靜謐肅穆的安息地，響起了清脆的槍聲……。

我在奧威爾式的寫作矛盾中糾結了兩三天，終於沒有忍住，寫下了這些近乎直白的文字，是想彌補某種遺憾，撫慰某種辛酸。

美國軍人為了一個他們不熟悉的國家和民族，來到一個他們從未經歷的險惡境遇，獻上自己的青春，犧牲自己的性命，保衛他人的自由和獨立。寫下這篇文字，記述來自美國的本末錯位、因果倒置的感動，我祈願我的同胞明白，在過去了七十年的那次中國民族危機中，誰應該感謝誰。

我沒有在這篇文字中記述文達爾 A. 菲利普斯的生平故事，我會在一篇散文裡完成這個心願。

2012 年 10 月 7 日凌晨草就
2013 年 5 月 26 日為美國軍人紀念日刪定
於美國維吉尼亞州